



西安地方志

2013·第6期

(总第225期)

陕新出连内印字第00016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目 录

我们的村落

- 西何家村(西何社区) (3)
- 星火村(中山社区) (5)
- 边家村(边家村社区) (7)
- 东何家村(东何社区) (8)

历代名人与西安

- 文成公主——播撒文明的天使 (9)

学术交流

- 发覆西安圆通寺 王民权 (11)

人物春秋

- 秦腔著名大净——田德年 (14)

史料钩沉

-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5)
- 习仲勋的西安逸事 孟德强 (17)
- 李先念过蓝田 沈孔利 孙兴盛 (21)
- 中国放弃对日索赔不能归咎于毛泽东
..... (25)
- 真实的“赤壁之战” (30)

西安风情

- 西安城门趣闻(三)——安定门 (32)
- 红埠街:长安皇城内第一横街
..... 张奂雅 (34)
- 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 (35)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 长安津峪口老油坊榨油技艺
..... (乌云高娃 整理) (36)

文史拾趣

- 季羨林三辞桂冠 (38)
- 朱自清的“三此”观 (40)
- 趣谈中国古代房地产买卖 (41)
- 金圣叹巧联惊四座 (43)
- 有趣的数字对联 (44)

志鉴动态

- 西安市区县修志工作研讨会召开 (46)
- 市地方志办公室召开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 (46)
- 2013年《西安年鉴》工作暨培训会召开
..... (47)

知识窗

- 清朝为什么没有宰相? (48)
- 一问三不知是哪“三不知”? (48)
- “无毒不丈夫”还是“无度不丈夫”? (49)
- 不孝有三是哪三个? (50)
- 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 10 首诗 (51)
- 西安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城市 (54)
- 最早在西安建都的朝代和帝王 (54)

历代诗人咏长安

- 终南望余雪 (唐)祖咏 (55)

解字

- “支” (24)
- “反” (35)

名句欣赏

-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等五句
..... (13)

《西安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冯艳阳
副主任:姚敏杰 任昆明 张 帆
王 莹
委员:崔义萍 杨军亚 彭栋为
高长安 姚文东 崔桂琴
富小云 张 耀 高 鹏

《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主 编:姚敏杰
副 主 编:高长安 宋亚颖
责任编辑:何彩云

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西安市凤城八路 109 号市政府
大院 26 号信箱
邮编:710007
西安地情网:www.xadqw.cn
西安市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基础数据库
<http://125.76.215.234:8080/difangzhi/>
E-mail:changannan6861@sohu.com
电话:029-86788731

村落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向上追溯,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祖先生活过的村落。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一个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或其他项目的实施,加之村落自身的开发等,村落在巨变,部分村落在消失。

为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西安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经市政府同意,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负责征集西安村落资料,《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西安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市政办发[2012]18号)已经下发。我们拟在资料征集工作完成后,编纂出版《西安村落记忆》(上、中、下),同时在“西安地情网”上开设相关专栏,留存西安村落资料,宣传西安村落。

本刊开设“我们的村落”栏目,目的就在于,配合该项工作的开展,讲述西安各个村落的发展轨迹,唤起记忆,畅想未来。



城改前的西何家村

西何家村

(西何社区)

位于南二环和太白路的交汇处——太白立交桥东北侧。2012年全村占地170余亩,848户,2550余人。因晚清中期由何姓两兄弟在此定居而得名,后续又有辛、王、赵三姓陆续来此定居,从而形成今日的西何家村何、王、辛、赵四大姓氏家族。清嘉庆《长安县志》有何家村的记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称何家庙,1950年以与冉何村区别改为现名。

1984年时有248户,1210人,耕地750亩。地处南二环沿线,地理位置优越。1993年

建二环时,一次性征地174亩,承诺每亩地补偿两万元。村民商量后不要国家的赔偿,拆迁指挥部作为补偿在二环路旁边给该村预留了34亩地。在拆除了40多家门面房后,村民还是坚持不要资金补偿,又在二环路南边赢得了32亩地。在这些地面上后来建起了4栋商务楼,每年为村里带来固定收入将近1000万元。经过多年的集体积累,目前,该村集体积累固定资产已达2.6亿元,年人均纯收入达1万元以上。在南二环建起了全区第一个住宅

●我们的村落●

小区。该小区共建成七幢七层、一幢二十八层,共 8 万余平方米住宅,且水、电、暖气、通讯、有线一步到位。大胆创新、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内引外联、在南二环临街建起了铁通大厦、金叶大厦、紫竹金岸和安馨园大厦 4 幢商务大楼,经过多年的集体积累,目前该村集体积累固定资产已达 2.6 亿元,人均股本 13 万元,集体年收入达 2300 万元,实现全村人均纯收入过万元。

于 2004 年上报了西何家村城中村改造方案,2005 年元旦成立了“城中村改造有限公司”,3 月完成撤村转户,7 月 1 日完成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造,实现了村民变股民,全村集体土地转国有土地。最终得到了 82.6% 村民的拥护和支持。

实施改造前的西何家村和所有的城中村一样,在经济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治安和安全隐患,全村危房林立、巷道狭窄、电线盘跟错节、污水遍地横流,但流动人口就是本村人口的 15—20 倍,达 5 万余人,且成分相当复杂。每到傍晚人头攒动,整个街道拥挤不堪。“四无”小店一家挨一家,生活居住环境十

分恶劣。

2006 年旧村拆迁实施以前,个别群众深夜偷盖房屋,针对这种情况,党支部、村委会首先发出通知,讲明利害,又果断的制止了这种现象的泛滥,而 45 名党员家庭无一家乱搭乱建,在群众中赢得了极好的口碑。6 月份又是老党员石卿云带头第一个与城中村改造公司签订了交房合同,带头拆迁,在群众中引起震动,共产党员刘小利仅用一周时间就清退了全院 28 家房客,为老百姓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为旧村改造带了好头。

西何家村首批获得省、市两级小康示范村和市精神文明单位,2005 年获西安市委旗帜工程综合示范先进村党组织,市级建设学习型城市先进单位、2006 年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我们的带头人赵建平同志也获得了市级劳动模范、省级劳动致富带头人及省、市、区人民代表等多项荣誉。

2007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 3 日整个新村建设 5 栋 32 层大楼,共计 1207 套住房全部依照房屋户型图顺利平稳地分到了老百姓的手中,没有出现任何争吵、打闹现象。5 栋 32

层 15 万平方米的西荷花园安置楼和一栋 12 层办公楼已经建成,2009 年 5 月全体村民已顺利回迁,配套的花园,绿地、假山、水景、健身广场、乒乓球馆、社区医院、内部银行、图书馆和党员活动室及警务室等项目都已投入使用,近 8 万平方米的商业楼已全部出租,28 层星级宾馆也已到后期装修阶段。全体股民人均年收入将突破 2 万元,人均住房超过 100 平方米,实现老有所养,少有所教,青壮年人人有工作。



城改后的西荷花园



星火村 (中山社区)

城改前的星火村

星火高级综合性合作社于 1956 年 2 月 6 日在新利公司成立，名称为西安市灞桥区长乐公社星火高级综合性合作社，办公地址在伍道什字 21 号。

建社初期，地处东关地区的“四星”生产队，包括金星、明星、五星、星火四个生产大队，当时就以毛泽东主席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名句，取名“星火”。总人口 252 人，其中男 129 人，女 123 人，劳动力 101 人；总户数 47 户，畜牧业 12 户，农业户 35 户，其中：地主 2 户，小土地租者 7 户，中农 2 户，贫农 24 户，土地总面积 240.66 亩，可耕地 216.7 亩，其中：186.2 亩，水浇地 26.5 亩，花园地 4 亩，土地大致分布东至田家湾，南至孟村、等驾坡，西至未央区杨庄村，北至新房村。下设工作机构：财务股、治安股、文教卫生股、副业股、农业股、饲养股、技术股、保管股、农业生产股、运输生产股、妇女生产股。

1958 年成立人民公社阶段，经上级政府

统一调剂，“就近按需”，实行土地“一平二调”，基本形成土地大块整体形态，使该村土地大致分布于雁塔区、未央区、灞桥区、新城区和碑林区五大块。

村民入社形式：土地、牛羊车马，农机具等，是年共有奶牛 42 头，奶羊 48 只，自行车 6 辆，大车 7 辆，架子车 3 辆，骡子 11 匹，马 1 匹，新式水车 1 部，瓦房 2 间，草房 18 间。

建社当年农副业总收入 1.53 万元，纯收益 1.11 万元，农民分配总额 9998.92 元，劳动日值 2.22 元。

由于建社后入社人员居住分散，从未形成比较完整的村子，隶属上级不断变化，先后隶属灞桥区长乐公社，灞桥区红光人民公社，灞桥区等驾坡公社，碑林区伍道什字人民公社，西安市郊区燎原人民公社，西安市郊区兴庆人民公社，碑林区永宁公社等。当时村办企业有小型翻砂加工厂、旅社等。

●我们的村落●

1977 年底,84 户,317 人,劳动力 132 人,其中:男劳动力 62 人,固定资产总值 6.5 万元,总收入 9.97 万元,社员分配总额 3.55 万元,人均 86 元。

1978 年 8 月,该村大学生张民洲利用休息日在村参加生产劳动,当时正在修污水井的村老干部夏忠诚不慎掉入井中,张民洲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下井救人,因沼气落入井中光荣牺牲。当时所在陕西师范大学以通报表彰,号召全体师生向张民洲同学学习,村党支部广为宣传,号召党员干部、村民学习张民洲同志舍己救人的高尚品德和精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该村先后筹建运营了村办翻砂厂,中山钢窗厂,1985 年继东郊半坡饭店,北郊双龙饭店之后又筹建运营了西安市第三家农民办企业中山饭店。1991 年与新城工商局筹建联营轻工业批发市场等,1992 年又筹建运营了村办秦林商贸中心,1993 年自筹资金 80 余万筹建秦林商业一条街等。

2006 年列入市政府城中村改造范围,由于地处小东门外,村民居住分散,分别居住在伍道什字东、西、南、北街,苗甫路、长乐坊、庙子巷、中和巷等地交叉居住。部分村民于 1990 年随当时市政建设已随当地居民拆迁安置,其他村民于 2007 年 10 月整村拆迁,已于 2010 年 10 月全部回迁安置。2006 年清产核资时集体总资产 1.04 亿元,其中,土地评估总值 8543.6 万元。(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土地变更为 7551.47 万元),集体经济转股份制的工作正在进行落实。

2008 年 9 月 28 日,经西安市碑林区人民



城改后的中山社区

政府批准,撤销碑林区星火村民委员会建制,组建长乐坊街道中山社区居委会,组建范围为原有星火村居民居住范围。社区建成后,其行政关系仍由碑林区农村工作局代行,长乐坊街道办事处配合做好指导工作。截止 2009 年资产总计 8957 万元,公积公益金 7478 万元,村集体经济社会总收入 8400 万元,村民分配总收入 390 万,人均收入达万元,原中山饭店改造后的商业楼招商工作目前正在筹划中,村民人均安置 40 平方米居住楼房。

该村先后获“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安全村委会”、“平安村”、“文明单位”、“文明村”等,1995 年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省级小康示范村”。

边家村

(边家村社区)



城改前的边家村

位于西安市太白北路与友谊路之间,东起边东街,西至边西街,南到友谊路,北止大学南路。

未有具体的文献记载,但据老辈人口述,相传在唐朝时有一名叫边绍的大将军,边家村周边属于其庄园部分,由于朝代更替,周而复始这个地方而得名“边家村”。当时的边家村由边、谭、刘三村合并而成,后来的边家村一队为当时谭、刘两村的原有地盘,在回民起义当年(1862年)三村散开,只剩下边家村。由于年代久远,边家村姓“边”的人家已无一户。再后来姚、郑、薛、廉、雒、葵、王等大户人家先后定居村庄,逐步形成了完整的村落。清嘉庆《长安县志》为边家村。清末合为边谭村,又名边谭刘。1950年恢复原名。

1957年边家村成立初级社,1958年成立高级社,“大跃进”后成立人民公社。民众们一起吃大锅饭,也一起抗过三年自然灾害。随着历史的变迁,村民们一起协作致富,先后修学校、建厂子,当年村民冯志远、王思易搞发展建学校,后来拆庙后选择庙南建立了当时的黄边张小学,即现在的“大学南路小学”。1959年,边家村同白庙村、何家村、吉祥村为一个大队,称永明大队。1961年年底分队后,四个村子分别以自己名字成立大队。边家村大队,包含一、二两个小队,总人口200多户,400多人,土地总面积约为200至300亩,一、二队的比例约为4:6,一队人少地少,二队人多地多。1967年、1968年村民雒金荣开办豆腐厂。改革开放后,实行土地承包制和分田到户,成为当时西安市的重点蔬菜区,蔬菜产量大幅度增长,村民的温饱有了保障,生活质量也开始有了质的改变。

1984年有104户,485人,耕地155亩。

2008年开始城中村改造前,该村主要经济支柱为出租房屋。2008年成立社区,社区命名仍用边家村,隶属于碑林区张家村街道办事处。2011年常住310户,834人。



城改后的边家村社区



城改前的东何家村

位于文艺北路中段,西南到水电设计院,北至 58 号院,东临文艺路,面积约 17.36 亩,总户数 260 户。总人口 740 人。

据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讲:东何家村建庄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清康熙年间。早年村民都以务农为主要生活来源,因此为人忠诚厚道。所以,四面八方的人都陆续搬来这里居住。该村以何姓为主,因村里人员过多而分散至东、西两处,为了区分,因此这里起名为东何家村。

1954 年土地改革后,成立了村民委员会。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人们封闭的思想和守旧的观念,村民的发展空间受到了制约,人们在贫困线上举步维艰。改革开放后,东何家村也伴随着改革的浪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0 年 12 月,村民由农业户口全部转为城镇居民户口,同年撤村建居,成为了碑林区名副其实的城中村。村民不等、不靠,在外打工、自主创业。用在外挣来的钱修建自家的房屋,并将多余的房间出租,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居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了 6500 元。

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城中村改造工程也迫在眉睫。但居民提起“拆迁改造”,可以用“谈迁色变”来形容这段痛苦的往事。因

东何家村 (东何社区)

为此前有过一次拆迁改造的经历,后因为开发商的中途撤离而夭折,留下的是拆了一半的家园。看着曾经的家已变成了遍地的瓦砾,他们的无助感与愤怒感可想而知。此时的东何家村人又走到了迷茫的十字路口。

2007 年 12 月 16 日,碑林区动迁组正式进入东何家村。但是,由于之前不成功的拆迁给居民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居民的抵触心理难以想像。动迁人员遭遇冷言冷语不少见,三番五次还说不通是常事,有的居民叫门就是不应,有的干脆躲着不回家,和拆迁人员玩起了“捉迷藏”。对于这一切,拆迁人员没有怨言,不闹情绪,更多的是理解,以真心换真情,用十倍、百倍的努力坚持着。2008 年 2 月中旬,东何家村拆迁工作圆满完成!



城改后的东何社区



文成公主

——播撒文明的天使

1300 多年前，唐朝文成公主离开繁华的都城长安，西行约 3000 公里，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雪域高原，与吐蕃王松赞干布和亲，开创了唐蕃交好的新时代。文成公主成为走出长安城的又一位杰出女性。

文成公主(公元 625—680)，名李雁儿，唐太宗李世民宗室女。汉族。聪慧美丽，自幼受家庭熏陶，学习文化，知书达礼，并信仰佛教。

讲文成公主，不得不先说说松赞干布(公元 617—650)其人。松赞干布自幼接受良好教育，精通武功。13 岁时，父亲被叛离的族人毒死，他即赞普位。即位后，一面缉查凶手，一面整训军队，在短时间内平息各地的叛乱，统一西藏高原各部，定都逻些(今拉萨)，建立了吐蕃奴隶制政权。

此时的唐王朝强大而繁荣，让松赞干布很是羡慕。在征服其他部落的情况下，松赞干布也把触角伸向大唐，开始可谓势如破竹，后

来却为唐所败。于是转而与唐结好，并于唐贞观十四年(公元 640)，遣大相禄东赞至长安，献金 5000 两，珍玩数百，向唐朝谢罪、请婚。唐太宗为结好吐蕃，以求西境安宁，于唐贞观十五年(公元 641)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嫁之。相传，禄东赞携带众多的黄金、珠宝等，率领求婚使团，前往唐都长安请婚。不料，天竺、大食、仲格萨尔以及霍尔王等也派了使者求婚，均希望能迎回贤惠的文成公主做自己国王的妃子。为此，唐太宗非常为难。为了体现公平，决定让婚

使们比赛智慧，谁胜利了，便可把公主迎去，这便是历史上的“六试婚使”，又称“六难婚使”，也有“五试婚使”之说，拉萨大昭寺和布达拉宫内至今完好地保存着描绘这一故事的壁画。

贞观十五年(公元 641)，文成公主在唐送亲使江夏王太宗族弟李道宗和吐蕃迎亲专使禄东赞的伴随下，出长安前往吐蕃。松赞干布在柏海(今青海玛多)亲自迎接，谒见李道宗，行子婿之礼。之后，携文成公主同返逻些(今拉萨)。据《吐蕃王朝世袭明鉴》等书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队伍非常庞大，唐太宗的陪嫁十分丰厚。有“释迦佛像，珍宝，金玉书橱，360 卷经典，各种金玉饰物”。又给多种烹饪食物，各种花纹图案的锦缎垫被，卜筮经典 300 种，识别善恶的明鉴，营造与工技著作 60 种，100 种治病药方，医学论著 4 种，诊断法 5 种，医疗器械 6 种。还携带各种谷物和芜菁种子等。

● 历代名人与西安 ●

组成成员除文成公主陪嫁的侍婢外，还有一批文士、乐师和农技人员。说明唐王朝对这件事是非常重视的，说明唐王朝对文成公主是非常关心的。这件事对西藏地区的影响，当时大家也许想过，也许没有想到。客观上，这件事对西藏地区后来的发展意义重大。

送亲和迎亲的队伍前呼后拥、威风八面地进入了逻些城，在李道宗的主持下，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按照汉族的礼节，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全逻些城的民众都为他们的赞普和夫人歌舞庆贺。松赞干布乐不可支地对部属说：“我族我父，从未有通婚上国的先例，我今天得到了大唐的公主为妻，实为有幸，我要为公主修筑一座华丽的宫殿，以留示后代。”

不久，一座美轮美奂的宫殿——布达拉宫就建成了，里面屋宇宏伟华丽。亭榭精美雅致，还开凿了碧波荡漾的池塘，种上了各色美丽的花木，一切建制都模仿大唐宫苑的模式，用来安顿文成公主，借以慰藉其思乡之情。1994年，布达拉宫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国内外游客的向往之地。

文成公主进入平静生活后，开始有意无意地影响和改变着西藏地区。文成公主所带的汉族乐师们为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演奏唐宫最流行的音乐，松赞干布对乐师和音乐大加赞叹同时，选拔了一批资质聪慧的少男少女，跟随汉族乐师学习，使汉族的音乐渐渐传遍了吐蕃的领地。文成公主所带的文士们，帮助整理吐蕃的有关文献，记录松赞公布与大臣们的重要谈话，使吐蕃的政治走出原始性，走向正规化。松赞干布欣喜之余，又命令大臣与贵族子弟诚心诚意地拜文士们为师，学习汉族文化，研读他们带来的诗书；还派遣了一

批又一批的贵族子弟，千里跋涉，远赴长安，研读诗书，把汉族的文化引回吐蕃。文成公主所带的农技人员把从中原带去的粮食种子播种在高原的沃土上，然后精心地灌溉、施肥、除草，使吐蕃的粮食产量大大提高；在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授意下，农技人员开始有计划地向吐蕃人传授农业技术。尤其是把种桑养蚕的技术传给他们后，吐蕃也逐渐有了自制的丝织品，美化了吐蕃人的生活。

当时的唐朝佛教盛行，而藏地无佛。文成公主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携带了佛塔、经书和佛像入蕃，决意建寺弘佛。她让山羊背土填卧塘，建成了大昭寺。大昭寺建成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亲自到庙门外栽插柳树，成为后世著名的“唐柳”。著名的“甥舅同盟碑”，也称“长庆会盟碑”就立在唐柳旁。现在大昭寺大殿正中供奉着的一尊释迦牟尼塑像，也是文成公主当年从长安请来的，后来文成公主又修建了小昭寺。从此，佛教慢慢开始在西藏流传。文成公主还对拉萨四周的山分别以妙莲、宝伞、右施海螺、金刚、胜利幢、宝瓶、金鱼等八宝命名，这些山名一直沿用到现在。

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后，中原与吐蕃之间关系极为友好，此后200多年间，很少有战事，使臣和商人频繁往来。

永隆元年(公元680)，文成公主逝世，吐蕃王朝为她举行隆重的葬礼，唐也遣使臣赴吐蕃吊祭。

文成公主一路在播种文明，一生在播种文明，中原文明源源不断地传入藏区，影响至今。

发覆西安圆通寺

◎ 王民权

故都西安多古寺，惜乎不少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仅在文献中见其梗概。其中有些毁于辛亥之际，有些毁于解放以后，圆通寺就是辛亥鼎革时毁掉的。

圆通寺亦称圆通观音寺，位于今西安东关孟家巷西南、五道十字东街以北，与唐太平公主为武则天祈福所建罔极寺隔巷对望。明嘉靖《陕西通志》卷三十六《民物》四《仙释》附寺观载其：“在府治东金花坊。内有元御史叶勒海寿碑。”乾隆《西安府志》卷六十一《古迹志·祠祀》载其：“《通志》：在东郭东金花坊。元至正十一年建。《县志》：明嘉靖二十六年，僧法冲拓地构楼，供《大藏经》七千卷，水陆神像五十轴。兴工时，有鹤数百飞鸣天际，遂题楼曰：‘瑞鹤’。本朝康熙五十三年重修。”嘉庆《重修咸宁县志》卷十二《祠祀》载其：“在东郭东金花坊。元至正十一年建。旧志。府内有元御史叶勒海寿碑。马氏《通志》。明嘉靖十六年僧法冲重修，四川按察使谢朝宣记。本寺碑记。二十六年拓地构楼，供《大藏经》七千卷，水陆神像五十轴。方竖柱，有鹤数百飞鸣，盘桓如相庆然，遂题曰‘瑞鹤’，长安张治道撰碑并志以诗。旧志。本朝康熙五十三年重修。《通志》。嘉庆八年复修。僧会司册。”一个比一个详细，《明清西安词典》又在此数志基础上，进而载其：“位于明清西安城东郭金花坊。元至正十一年(1351)建。寺内有元御史叶勒海寿碑。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拓地构楼，供《大

藏经》七千卷，水陆神像五十轴。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重修。宣统三年(1911)毁。”然而，质诸尚存《奉元路圆通观音寺记》碑碑文，诸志及词典于此寺由根到梢，都有记载不确或谬说之处。碑曰：

尝谓吾儒与释氏，如阴阳昼夜每每相反，然日为阳而明于昼，月为阴而明于夜，实并行而不相悖焉。圆通、佛氏均谓之释，特阴阳不相同耳，故其法曰末法，禅曰左禅，其化人示验，如日月之光不可偏废，人亦不得而遏之，非徒不遏，又从而信之，有由然矣。

奉元路东郊之北有何禄氏者，世居斯地。往来江湖间，衣粗食淡，遇穷困颠连，济施不吝，人皆称号“溥惠长者”。一日在金山从法义禅师授《华严》义，奉菩萨戒，滋久益严。尝手抄《楞严》《法华》《普门品经》凡数百卷，朝夕称念“佛菩萨”号每日数百，归庄率众供僧每以千数。又作龙华之因，习天台、贤首二教，退则跪诵繙《大藏经》，身不旷里，口不绝声，祁寒暑雨，如是不怠。至正二年壬午日食之夜，忽见东南隅有祥光，五色如云，聚集不散，人皆异之。次日再观，光亦如是，乃率善众掘得石菩萨一尊，容体衣纹，宛如天成，远近来观咸以何禄氏信心感召，或此地旧为寺基，秘久呈现。事闻安西王，寻亦感梦，果如所闻，乃命比丘如海同发善心，为修造主，于是合众施为殿藏阁寮，前庖后寝，凡费六百万。工始癸未之春，讫庚寅之秋，历七年而后成。檀越李万

●学术交流●

成等,又共施三百万,为二佛、六菩萨、十八大士群卫之像,遂为一方俱瞻。

信今述古,吾儒之事,璧峰之言,谅不我诬。昔终南石佛放光,程簿拒而不往,曹卒偶得佛指,终身破臂以藏。佛菩萨之灵异,儒俗之信否,古今人一也,独何禄氏等事释之诚,抄经之苦,不亦为世之强梗者劝哉?吾窃附韩文公通大湫之书、陈止斋跋徐夫人写佛经之卷,乃承王命,为璧峰复之,俾后世知修寺之因肇于此云。

大元至正十一年岁次辛卯二月甲寅日立石

陕西廉访司廉访使斡勒海寿撰

璧峰释师石宝金书

碑文录自宋联奎《苏庵杂志》卷二之《圆通寺碑》,并见于其所修《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七《祠祀考》所附《寺观》。宋为西安东关人氏,初字聚五,后作菊坞,号鞠叟、青门鞠叟等,清季宦游滇蜀,民初曾任陕西都督府顾问、陕中道观察使、陕西民政长、陕西巡按使和总统府顾问等,1923年倦归西安后,先后受聘省政府顾问、省通志馆馆长,并一度担任省临时参议会议长,解放后任省政协常委和西安市郊区土改委员会委员至1951年7月逝世,重视并熟稔关辅掌故,主纂两县续志之外,还参与纂修《续陕西通志稿》并主持了《关中丛书》的编纂。《苏庵杂志》刊行于“著雍敦牂”即农历戊午公元1918年,菊坞自谓“长安寺观,辛亥后率多圻毁。东关有圆通观音寺,为元至正时所建,至是亦毁。寺有碑记凡五百五十余字,碑之阴刻佛像百余尊,委榛莽间。将取作修渠之用,余惜其为数百年古物,乃移之高楼村北极宫内。”两县续志劖劂于民国25年即1936年,志中谓其“元至正十一年建,有碑记廉访使斡勒海寿撰。宣统三年军兴,县境

寺观多毁,此寺亦与焉。惟碑独存,阴有佛像百,将取作修渠之用,邑人宋联奎惜其为数百年古物,乃移之高楼村北极宫。”爰知此碑清末尚存,而碑文告诸世人的,不仅有建寺之因,建寺之时和建寺之人,还有寺之格局,寺之陈列,以及立碑时间与夫撰碑、树碑之人,远较前举诸志、词典为多,也更为立体和丰满,惟惜原碑辛苦移至该寺附近罔极寺西邻北极宫后,数更寒暑,今已渺焉不知所终,无复有人提及矣。菊坞两处迻录文字,小有不同,无由以原碑做仔细的校勘,自是遗憾,然基本清通无碍,而其劫后余灰,“硕果仅存”,除过告诉人们更多此寺信息之外,亦足以证明自明以降,至少在两个关键问题上,诸志、词典的记载存在明显错误:

其一,该寺寺碑立于“至正十一年岁次辛卯”,即1351年,但该寺建寺之时间,则为“工始癸未之春,讫庚寅之秋,历七年而后成。”“癸未”,即元至正三年,1343年;“庚寅”,即元至正十年,1350年。“癸未之春”至“庚寅之秋”,其间相隔正好七年,工期乃碑文清楚记载着的。嘉靖《陕西通志》、乾隆《西安府志》、嘉庆《咸宁县志》和《明清西安词典》,包括《咸宁长安两县续志》,都将立碑时间,误作建寺时间矣。

其二,该寺寺碑撰碑者为“斡勒海寿”而非“叶勒海寿”。经查,“斡勒海寿”,《元史·本纪》第四十二载,元顺帝时曾任监察御史,顺帝九年(己丑,1349)七月因“劾侍御史哈麻及其弟雪雪交结脱忽思皇后近侍。”被“出”为陕西廉访司副廉访使,旋升廉访使,十二月“吴天保陷辰州”,脱忽思皇后诉之于帝,又被免官,而“叶勒海寿”则这几部志书和词典之外,一概于史无证,其出任陕西廉访使云云,更是

海客之谈，嘉靖《陕西通志》、乾隆《西安府志》、嘉庆《咸宁县志》和《明清西安词典》，也都将“斡勒海寿”其人，误作“叶勒海寿”矣。

幸亏《苏庵杂志》和两县续志，感谢菊坞先生。倘若没有先生及其《苏庵杂志》和两县续志，则不仅此寺丰富而生动的历史真相，无由重见天日，纵其建寺时间与撰碑者姓名，相信亦将因为上举诸志和词典的误导，永远错将下去矣。志乃千秋功业（词典同理），信实为第一要求，修纂者史才、史识、史德无一不备，犹须临渊履冰，慎之又慎。嘉靖《陕西通志》主纂马理、吕楠，均一代名儒，志亦为一代名志，于此寺竟未加详考即率尔命笔，让人无法不失望于贤者。乾隆《西安府志》为毕沅抚陕时由舒其绅、严长明修纂，与役诸公亦皆饱学多识一时之选，于此寺增补信息的同时，竟将其年代误植，碑暨撰碑者隐之，也让人不得不重为之叹。嘉庆《重修咸宁县志》人许“严于考据”，亦称名志，于上述两点竟亦将错就错，仍之不改；菊坞两县续志，幸将碑记全文转录并

将撰碑者予以更正，又复沿袭陈说，将其建寺时间仍载作“至正十一年”，同样让人不解之余，而复遗憾。考其各志纂修也，前三者寺碑皆在，移步可按，后者寺虽不存而碑文在手，稽之即知，是以前各自教训若出一辙，至其缘由，则诚非“一时疏忽”所堪尽释者。《明清长安词典》，成书于1998年，再版于2012年，当此时也，寺毁有年，碑亦杳然，其一遵前志以照猫画虎，从而不免一错再错，似乎情有可原，但其竟置《苏庵杂志》，尤其两县续志所刊碑文和后者正确记载于不顾，查找文献不周，或疏于必要考订，从而初版如此，再版如此，继续误导读者，恐亦不无轻忽之则，怠惰之咎。凡此再再，适足以成为当今志坛可宝之镜鉴，提醒董此业此者续时时加以对照，明其职守，笃其心志，强其内功，慎其载笔，始终保持必要、足够的警惕而不稍懈怠，庶几避免重蹈覆辙，再犯类似的错误，而编纂“精品”志书的宏愿，也不致成为一句动人听闻的美丽空话。

·名句欣赏·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载孔子语

使：听使唤，受指挥。

【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载孔子语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语

弘：扩充，光大。

【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语

道：志趣，信仰。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载孔子语

桴：小筏子。



田德年

秦腔著名大净 ——田德年

田德年(1889—1978)秦腔演员、工大花腔。陕西长安人。自幼家境清贫如洗,父母双亡,姐弟相依为命。为求生路,14岁那年,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背其亲姊,私自考入长安县郭杜镇香积寺德庆班。

先学小生,因中途嗓子倒仓,被戏班淘汰,回家帮其姊操持家务。偶尔一次井边打水,他对着井口喊了一声,嗓子又出来了!且不是小生声音,而是一副满腔满调的花脸腔,从此他暗暗对井淘(练)声,三九三伏,坚持不懈,天长日久,受益匪浅,村里的乡党们称赞道,“没想到这娃倒淘出了一口花脸声,将来一定是个好唱家。”不久,他又回到德庆班从艺。改工花脸。民国十年(1921),德庆班家世败落,箱底产业荡然一空,演员各奔东西。这时田德年已32岁,离陕赴甘,于秦宏班唱戏求生。不期一年又与陈景民(正旦)一同创办了新兴社,因他的花脸戏唱得出众,剧社亦红极一时。陈景民财成业就,分给他一半箱底,由他另领戏班演出。一年后班散,又到王义民等班搭班谋

生,经常奔波于凉州、张掖、酒泉、武威、兰州、宁夏等地,整整熬过了30多年。1952年西北文化部组织西北戏曲赴京观摩演出团,他被邀请参加了第一届全国观摩演出,受到京都各界好评。同年受马健翎聘任到西北戏曲研究院演出并任教。

田德年的唱腔刚中有柔,柔中寓情,情中含巧,巧中出戏,吐字清晰,急缓得当,韵律规范,余味无穷;演唱方法讲究,虚实结合,抑扬顿挫,四声分明,以气打字,以字带声,以声传神,扬长克短,对秦腔花脸特有的“将音”、“膛音”、“傲音”、“罡音”掌握精当,运用自如。他的高音区域甜润明亮,中音区域宽壮浑厚,低音区共鸣有力。他的唱腔既以高昂、柔润、激越、严谨见长,而又以饱满、淳朴、豪迈、深情出名,给人以余音绕梁不绝之感。他不循旧法,善创新调。为了克服秦腔花脸发声喉音过重、干嚎、硬吼、声嘶力竭的弊端,他采用以丹田音为主,辅用鼻音和胸音共鸣行腔,并善于运用运气和换气技巧,借字换气,明换暗偷,使其所唱腔调绝妙独特,他人莫及。(下转第17页)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 547 人,候补代表 208 人,代表全国 121 万名党员。

早在 1937 年 12 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通过了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但由于长期紧张的战争环境,一直没有召开。直到 1945 年 4 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在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斗争的关键时刻,为了团结全党全国人民,争取光明的前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1945 年 4 月 21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党的七大的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指出“七大”的方针是:“团

结一致,争取胜利。”

在“七大”正式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了大会,致开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大会讨论过程中,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发言;由华北、华中、西北等几个有代表性地区的代表作了工作报告。大会完成了三个历史性的任务:决定了党的路线,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郑重地提出了中国人民强烈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在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激烈斗争中,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报告还

●史料钩沉●

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大会通过了刘少奇修改党章的报告及新党章。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使全党有了在思想上工作上取得一致的牢固的理论基础。

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关于军事报告的决议案》及《关于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选举中坚持三个原则:第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第二,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组织进中央委员会;第三,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

选出来。大会选举出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会委员 44 人,候补中央委员 33 人。6 月 19 日七届一中全会选举出 13 名中央政治局成员,选举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的。这次大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最成功的一次代表大会,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次大会,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它在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 20 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

(上接第 14 页)

田德年会戏甚多,可演折戏、本戏一百余出,《三闯辕门》中的张飞,《玉虎坠》中的马武,《斩单童》中的单童,《苟家滩》中的王彦章,《于让剃袍》中的于让,《黄河阵》中的黑虎,《八义图》中的屠岸贾,《白叮本》中程咬金,《抱琵琶》中的王延龄,《红梅阁》中的贾似道等,个个都能演得栩栩如生。他尤擅包公戏,扮《铡美案》、《打龙袍》、《八件衣》、《赤桑镇》、《打鸾驾》等戏中的包公,各具特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8 年到 1959 年,两次随陕西戏曲演出团赴京演出并巡回江南十

三省,名声大振,粗犷火暴的秦腔花脸表演,引起大江南北观者的赞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贺龙、陈毅、邓子恢、薄一波、习仲勋、谢觉哉等登台祝贺。周扬、田汉、曹禺、欧阳予倩、梅兰芳、马连良、荀慧生、袁世海等名家亦称赞他的花脸演法“很上味”。

田德年治艺严谨,平易近人,乐于提携后学。20 世纪 50 年代被选为陕西省第二届人民代表,西安市第二届政协委员。196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 年(76 岁)退休。1978 年 8 月 27 日病逝于西安,享年 89 岁。

习仲勋的西安逸事

◎ 孟德强

“胡耀邦是个好同志”

“文革”期间，习仲勋被扣西大一个月左右，一天上午，从北京来的两名红卫兵通过学校“文革筹委会”找到我和习仲勋的住处，要他写一份“揭发”胡耀邦的材料。习仲勋一听勃然大怒：“你们这两个娃娃，真是没事找事！胡耀邦能有什么问题？我啥也不能给你们写！”两人一听，发了红卫兵的脾气。我怕他们动粗，赶紧上去调停：“你们俩先出去一下，等他平静下来再说。”两人互看一眼，然后愤然离去。我关上房门，对盛气未消的习仲勋说：“他们远道而来，你不写点什么，估计他们不会善罢甘休。”习仲勋略一沉思。点头表示同意。我递给他几张纸，看着他开始动笔。不到几分钟，材料已经写好。我凑上去一看，只见上面只有寥寥几个大字，大体意思是：我和胡耀邦是在延安认识的。那时候我们经常见面。建国以后，我和他先后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部门工作，来往就不多了。但是，对胡耀邦我还是了解的。胡耀邦是个好同志，他绝对不会反对毛主席。

我给他的几张纸，一张都没有写满。

我打开房门，两名红卫兵立刻冲了进来，一见习仲勋写给他们的“揭发材料”，气得捏紧了拳头。这时习仲勋漫不经心地看了他们



1949年6月，习仲勋在西安各界保卫西安动员大会上讲话。

一眼，不慌不忙掏出那根从不离身的紫黑色斯大林式烟斗，装上一撮我代他买回的丰收牌烟丝，点燃后悠然自得地抽了起来。

来人未达目的，气得暴跳如雷。我怕他们再生事端，马上好言相劝。两名红卫兵无计可施，最终只好拿上材料，悻悻离开。

此后不久，农垦部一个造反组织派来的两名干部找到我们，要习仲勋“揭发”王震。习仲勋写给他们的材料，文字几乎和“揭发”胡耀邦的材料完全一样，只是把“胡耀邦”三个字换成了“王震”。

由“毁门”事件说团结

一天下午，我陪着习仲勋走出三号楼，漫步到学校北门口。习仲勋在门口停下脚步，望

●史料钩沉●

着门外的大路，似乎有万千心事。这时，忽然有一辆卡车从外面开来。车到门口，转弯、掉头，我看到车头上印有“西安交通大学”几个字。车一停，便跳下几个红卫兵，他们迅速取下两根一头儿固定在卡车上的粗钢丝绳，把事先已打好结的另一头儿套在了学校的一扇铁栅栏门上，然后快速爬上卡车。正当我们对眼前的一幕惊诧不已时，只见卡车猛然开动，加速前进，紧接着一声巨响，那扇原本固定在水泥粗桩上的铁栅栏门

轰然倒地，被拖出二三十米远。而后，卡车紧急刹车，几名红卫兵迅速取下套在铁栅栏门上的钢丝绳，扔上车厢，然后跃上卡车，卡车猛一加速，来犯者扬长而去。

事情发生得实在突然，前后不过一两分钟。等到我们回过神来，来者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后来我们才得知，这次突然袭击，原来是“西安交大造反派”对“西北大学造反派”的一次“报复”。

我告诉习仲勋，西大和交大原本是同一战壕里风雨同舟的一对战友，同属于“西安地区大专院校文化革命统一指挥部”旗下，但1967年年初，交大被组织内部认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从此“兄弟反目”。

西大造反派的一个战斗队为了降低交大在西安的影响，想出了一个怪招：拿上几根排笔，提上一桶墨汁，对交大贴在街上的大标语进行“移花接木”，方法十分简单：把大标语后



1959年6月6日，习仲勋在陕西渭南双王公社向农民了解小麦生产情况。

面的署名“交大xx战斗队”中的“交”字涂掉，前面加一个“西”字。情急之下，交大在钟楼上了一幅被改过的大标语之贴出了一张这样的大字报：西北大学真阔气，新添一个改字系，学生个个有出息，会把“交”字改成“西”。这次“毁门”事件，就是交大对西大的“报复”。

我讲完事情的原委，习仲勋脸色凝重，没有多说什么。

当天晚上，我们睡得很晚。习仲勋对两校之间不团结的现象深感忧虑。后来，他给我讲了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的一段往事。他告诉我，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陕甘宁边区革命队伍内部进行了一场“肃清反革命运动”。由于忽视了团结，革命队伍内部出现了矛盾，结果不少革命战士被错误地定为“反党分子”，给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接着，他又对我讲了许多加强团结、化解矛盾的道理。我认真听着他的讲述，直到很晚才渐渐入睡。

巧遇杜鹏程

习仲勋落难西大前后，西北大学的红卫兵还先后扣留过西北局、陕西省委和陕西作协的诸多“牛鬼蛇神”。这些“改造对象”一般没有设专人管理，只是被限制在三号学生楼的中文系男生宿舍里写“交代材料”，有些人偶尔还可以走出三号楼，在校园里走动。

3月初的一天，正值午饭时间，我和习仲勋各自拿上餐具，一起到食堂打饭。走出宿舍楼不远，只见不远处一位50岁左右的高个男子正向我们走来。此人肩扛一根长约两米的甘蔗，像一位扛着步枪的老兵。我和习仲勋不觉放慢了脚步。来人走到跟前，我俩定睛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之前和习仲勋一起在西北体育场挨批斗的陕西省著名作家杜鹏程。杜鹏程显然也认出了习仲勋，两人四目相对，相顾无言。对视一阵后，习仲勋只对杜鹏程说了两个字：“挺住！”杜鹏程面露宽慰之色，也只说了两个字：“保重！”

原来，杜鹏程当时也被扣在了西大，就住在我们楼上。

当晚的夜谈，话题自然涉及杜鹏程，并由此谈到他的小说《保卫延安》以及延安保卫战。最后，话题转向1947年春天胡宗南进犯陕北、中央军委和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的情形。习仲勋说，毛主席当时住在延安王家坪一个窑洞里，撤离时间是1947年3月18日下午。要撤离住了十年之久的延安，毛主席虽然依依不舍，但处变不惊，从容镇定。毛主席是在得知中央和延安机关、学校以及群众安全转移和疏散完毕后才走出窑洞的，刚离开窑洞

没几步，突然有国民党飞机从天空呼啸而过，一颗炸弹系偏不倚，正好落在毛主席刚刚离开的窑洞门前，把地面炸出了一个大坑。面对如此惊险的场面，毛主席不慌不忙，安之若素，并非常风趣地说：“好啊，这是胡宗南为我放爆竹送行。”习仲勋说，他和彭德怀一直把毛主席送到延河边，看着他上了汽车，他们才离开。此时，天色已近黄昏。

撤离延安的前一日，毛主席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命令指出，自3月17日起，边区各兵团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自此，习仲勋和彭德怀一起肩负起了保卫延安的重任，在边区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取得了战争的彻底胜利。

自奉节俭与慷慨助人

2月底的下天早上，习仲勋先我而起，洗漱完毕后回到住处，手里多了一块六七寸见方的蓝色布头。他告诉我，布头是在楼梯口捡到的，洗一洗，可以当作我们的擦桌布。

我一眼就认出了这块布头，它原先是钉在我们班宿舍楼道墙上的一块补丁布。我们班其他男生和我俩都在三号学生楼住，他们住在三楼，我俩住在二楼，我常常往来于两层楼之间。

1967年的二三月间，西北大学的“革命”一片混乱，同学们不知道“革命”怎样进行，于是同班同学之间也展开了“斗争”。我们班党支部书记霍银狮入西大之前已是西安矿业学院团委书记，此君年长我们五六岁，为人忠厚善良、热情豪爽，在同学中极有威信。但是，当时却被当作“保皇派”、“校党委的黑干将”，受

●史料钩沉●

到同班几名同学的批判。此前，一位王姓同学的裤子后裆磨破了一个大洞，霍送他一块布头，让他在学校缝纫社补好了裤子。霍受批判时，这位同学在楼道里给他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并拆下补在裤子上的补丁，用图钉钉在了大字报旁边的墙上，说这块布头是霍“拉拢腐蚀”他的证据。布头在墙上展示了几几天，后来图钉脱落，布头落地，几经风吹人踏，最后不知怎么就从三楼的楼道里掉到了二楼楼梯口。

不等我动手，习仲勋已经洗净了这块布头，从此，它便成了我们的擦桌布，一直用到他离开西大。

习仲勋有抽烟的习惯，但抽得并不多。习仲勋初到西大的当日，即指名要我代他买两包“大前门”牌香烟。这两包香烟，他抽了整整十天。一抽完，他就告诉我，为节省开支，今后他要改抽烟丝。一包“大前门”香烟，当时售价3角4分钱，以五天抽一包计，一天抽烟的花销是7分钱；而一包兰州产的“丰收”牌烟丝，重量为3两，售价仅5角2分钱，却可以抽上二十多天，如此算来，一天抽烟的开支，仅有两分多钱。他说，节约是一种美德，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

一个紫黑色的斯大林式烟斗，是习仲勋从洛阳带来的心爱之物。这只烟斗，他几乎从不离身，有时不装烟丝，他也会含在嘴里做出抽烟的样子，吧嗒吧嗒，十分有趣。

西大的学生食堂办得不错，一日三餐，总共只需5角钱。无论什么饭菜，习仲勋都吃得津津有味，72天里从未浪费一个米粒、一口菜汤。西大西门外的国营边家村食堂出售一种8毛钱一斤的腊汁肉，每隔十天半月，我会买回半斤，夹在四个热馒头里，每人两个。这曾是

当年我们最喜欢的美食。

3月初的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越南的信件，寄信者是我的越南朋友黎章疆。黎曾在西大留学一年，留学期间，我们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朋友。1966年9月，他离开中国，回到越南，成了一名战士，投入到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战场上。黎章疆的这次来信，向我报告了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并谈到美国侵越战争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生活困难。他告诉我，越南市面上诸如手电筒、针线、肥皂、洗衣粉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完全买不到，他要给我写信，连信封、信纸都没有，最后，他希望我能寄给他点信封、信纸，以便能随时给我写信。我把信给习仲勋看过，准备马上下楼去买信封、信纸，这时习仲勋突然对我说：“从我的生活费里拿上10块钱，给这个越南娃娃买个手电筒，再买上些肥皂、牙膏，和你要寄的东西一起寄去。”我告诉他，他的零用钱已经所剩不多，再说他也不认识我的这位异国朋友，不能让他花钱。习仲勋听完笑着对我说：“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你看那个越南娃多艰难！”盛情难却，我便在代为保管的他的零用钱里拿出了10元。不料，我跑遍西安几条大街的所有商店，除了信封和信纸，其他东西都没有买到。那时，这些日常用品在西安也已经不见了踪影。回到宿舍，我把情况告诉了习仲勋，他感到非常遗憾，连声说：“真想给这个越南娃娃帮个忙，可就是帮不上！”虽然他的一片好意最终落了空，可是他主动帮忙、助人为乐的精神却令我非常感动。

岁月已久，斯人已逝，然而，46年前的一幕幕，如今仍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摘自《领导文萃》2013年17期）



李先念过蓝田

◎ 沈孔利 孙兴盛

1946年1月,国共两党达成“停战协议”,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调集30万大军,扬言要在48小时内一举吞掉我中原解放军主力。6月23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局:“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并强调指出:“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贻误时机,并保机密。”中原局、中原军区按照中共中央事先安排分南北两路向西突围。这一事件,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认定为解放战争爆发的标志。

中央军委听取了汪锋和陕西工委的报告,于7月15日向中原局通知,向陕南游击队靠拢。陕西工委在汪锋安排下先后派出十多名领导干部进入陕南,做好中原突围接应工作。

1946年8月10日,汪锋受中央委托,带

五名随员从马栏化装出发,前往商洛。历经艰险,不几日回到老家蓝田县许家庙街子村。很快和先期派回的穆继曾、刘安华、祝彦虎、穆志远等联系上。三五日后,胡宗南发现行踪,派出几拨侦察小组赶往许家庙。蓝田地下党获悉省保安团将对蓝田东山地区进行围剿,汪锋等连夜登上歪嘴崖,并派父亲王生茂(汪锋原名王均治)扮作生猪贩子只身进入霸龙庙、青岗、两岔河等地寻找农民武装领导人刘堂印。经半个月的努力,在刘堂印领导的农民武装基础上建立起60多人40余支枪的“蓝田游击队”,按照汪锋指示,游击队在清峪、姜山、高巅一带活动。9月初,蓝田游击队与蓝洛支队(22支队)会合,编为第三大队,刘堂印任大队长,穆继曾任教导员,活动在许家庙、厚子镇、青岗坪一带。

9月8日中午,刘兆英迎接汪锋一行前往

●史料钩沉●

商县封地沟(现归丹凤)。9月中旬李先念来到这里,和汪锋见面。李先念要求尽快把郑位三、陈少敏等中原局领导先期送回延安。9月24日正式成立中共豫鄂陕边区党委,李先念代表中央宣布汪锋任边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和行署主任,从此,李先念把他亲自创建的豫鄂陕边区及中原部队交给汪锋,准备安心地回延安。

9月19日,汪锋给中共中央并西北局习仲勋致电确定:“李先念、任质斌拟经渭南王德民家,再经韩国璋地区、马额魏新发处,再到栎阳仵安升同志家转关系,途中均利用当地党的合法武装掩护,并派王启德带路,请陕委在十日内叫渭南或直接派要人通知王德民家接洽,以便顺利通过。”陕西工委书记赵伯平接电后,作了详细安排,并电告西北局负责人习仲勋。

9月26日李先念一行离开商县,汪锋同志亲率夏世厚带蓝洛支队护送。29日到达清峪青岗坪(时属渭南管辖),晚上住进芋子沟陈启文家。当晚召开区长、游击中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蓝洛县县长王智德向李先念汇报了霸龙庙、青岗坪一带敌我活动和去临潼栎阳路线等情况。李先念对蓝洛民主政府及中队长以上干部作了重要指示。为了李先念一行万无一失,蓝洛支队已将沿途30里以内的国民党地方势力赶到蓝田县城左右,在李先念将要经过的翻山口,由刘堂印至交好友秦培坤密切监视许庙乡长、军统特务王喜文的动向。更重要的是,由于李先念必须绕开厚子镇,折向北峪,翻过祝家沟到达石鼓山脚下,所以提前安排第三大队队长刘堂印带领第八中队守候在北峪石瓮上边,以作掩护。

第二天上午,李先念从芋子沟动身,汪锋带夏世厚并蓝洛支队,和蓝田县东川地下党负责人穆继曾(杨寨村人),翻南古庄岭到达清峪上场村,并派交通员穆春发(杨寨村人)到渭南县大王镇与地下交通站王德民(合法身份为伪马峪乡乡长)、刘正印(合法身份为伪马峪乡特务班长)联络,约定当晚10点钟在厚子镇以北的菜脑背后接头,同时商定了联络暗号。

清峪沟全部是红区,上场村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李先念一行在中午饭时辰住进上场村。谁知,就在李先念一行于上场村休息等候交通员返回时,传来噩耗:

原来提前秘密安排在北峪石瓮的第八中队被叛徒苏东印(清峪庙人)告密,蓝田、渭南两县联合出动200余名保安团欲进山剿杀,蓝田地下党获悉消息后,急派人暗暗送给汪锋的父亲王金茂,要他设法传达给交通员贺流。王金茂老汉获得信息,连忙离开街子村,翻过两条岭三道沟,摸着夜路行走15里赶到贺嘴头贺流的家,此时已近午夜,“砰砰砰,砰砰砰”紧急的敲门声惊醒了睡梦中的贺流,忽听大门发响,连忙披了衣服走到门前,问:“谁呀,半夜三更地敲门干啥?”须臾,门外传来低沉苍老的回声:“我,姓继名曾。”

贺流一下子慌了,这是地下工作者最近的联络暗号,立即打开大门,将来人让进门内。灯下,贺流认出这是汪锋的父亲王金茂,拉了把椅子让他坐了,并张罗着倒水。王金茂老汉说:“还喝啥呢,事情紧急,我是来传递情报的。刘堂印和高让驻扎在北峪石瓮杨家独庄,敌人知道了,马上要进山围剿,组织让你速送口信,命他们赶快撤离。”

送走了王金茂老汉，贺流再无睡意，穿好衣服，扛了扁担，打扮成割柴的樵夫，在东方露出启明星的时候走出家门，他要赶在敌人到来之前到达北峪。从贺嘴头到北峪去，要翻两条沟，沿车贺两岭走到清峪口，至少得走 20 多里路，花两个多小时，加上天黑路窄，行走不便，赶到清峪口，天已大亮。扛了扁担急急向石瓮奔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敌保安团黑压压一片，吆吆喝喝向石瓮扑来。

贺流连爬带滚上到杨家独庄，见中队队员刚刚吃完早饭，连碗还没洗，正在扎裹腿，老远就喊：“快跑，保安团来了，人多得很！”

中队长高让（时玉山乡楼祝村人）丢下正洗的碗，进屋里说：“大队长，快，你们翻后窗子从后山逃走，我来狙击，掩护你们。”

刘堂印要让大家转移，他来抵挡，高让一把将他推出后窗，腰里别了手枪，扛起机关枪冲出大门，将机枪架在门前山崖上。保安团的兵员趴在杨家独庄门前硷下，枪口齐齐对着杨家独庄，开始射击。高让“哒哒哒哒”一排子弹向保安团射去，枪口前边“哗哗哗”倒了一地。敌人慌了，从侧旁溜上去两人，跑到高让身后，一子弹射到后背心，从崖上翻了下来，血流不止，当即软瘫下来。为了掩护刘堂印他们撤退，22 支队三大队第八中队长高让，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刘堂印他们翻过杨家独庄后山，再翻两座山梁，到了南峪的赵老沟，向暂时休息在上场村的汪锋一行汇报去了。

保安团命令厚子镇第二保保长王生财上前，把高让的头割下来，用一个牛笼嘴提了，送往国民党蓝田县政府。渭南保安团扛走了高让的机枪和那把手枪。

汪锋一行在上场村得到刘堂印等人汇报，得知北峪被敌人扫荡的消息后，一时沉痛不已，特别是李先念，当即低下头，为护送他回延安而牺牲的同志感到痛心。恰在这时，派去与大王乡王德民联络的穆春发回来了，说一切安排就绪，晚上十点钟在菜脑背后见面。穆继曾正要讲“情况有变”，被汪锋挡住了。他说：“好事中有坏事，坏事中有好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李先念趁机也说：“敌人以为打退了我们，一时不敢轻举妄动，甚至绝对不会再走北峪，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偏偏走北峪。现在正好动身。”汪锋也说：“行，说走就走，天黑前赶到北峪口，神不知鬼不觉地就过去了。”

穆春发在前边领路，汪锋、穆继曾、夏世厚等人，把李先念裹在中间，一行人又上路了。天麻擦黑，恰好到北峪口。

村里人因为一大早发生的枪战，还有那血淋淋的人头，心理还在恐怖中，每家人早早地都把门关了，沟里沟外几乎见不到一个人，除了树上不时地发出乌鸦凄厉的叫声外，暗夜静悄悄的。汪锋一行踏着战友们的血迹来到岔道口，向西一拐，进入祝家沟。没有一个人说话，几乎听不到脚步声。上山，下山，不一会儿来到石鼓山脚下一个偏僻的低洼处，大家都长长地舒一口气。几个随行的士兵一屁股坐在地上不想动弹，李先念两手插腰，笑一笑说：“小伙子噢，还没我的精神大啦！”

休息片刻，夏世厚叫蓝洛支队护送的战士从包袱里取出几个人的衣服化装，李先念化装成国民党的少将参谋，胸前佩戴陆军大学和西北军政干校两枚证章。这身将官服就是汪锋回蓝田时穿的那一套；任质斌化装成书记官；其他几人分别化装成随从卫士，和陪

●史料钩沉●

同的当地军官。化装完毕，一行人按约定时间到达约定地点，对了暗号，准时见到了渭南县大王乡前来接应的刘正印及七名武工队员。汪锋、夏世厚、穆继曾等，一一与李先念握手道别。

送走李先念，汪锋等人返回清峪，当晚一直担心领导的安危，整夜不眠，辗转反侧，遂披衣下床，吟诗一首：

师座宿青坪，谈论破五更。
临行言未尽，惜别柳桥情。

四海阴云扫，三川红日升。

延安早日到，一路踏春风，

在汪锋的精心安排下，李先念离开蓝田，由各县地下党和地下武装护送，经渭南大王镇、临潼铁炉镇、马额镇，富平洪水头，省工委书记赵伯平再派原柳林交联客栈负责人张仲平率百名武装赶来接应，冲过耀县要隘村封锁线，然后一路顺风，终于到达陕北。

10月21日，中共中央电告汪锋：“李、任已安全到达关中工委，请释念。”

·解字·

“支”

①

②

③

“支”是个会意字。①是《说文》中古文的形体，像手持竹枝或树枝之形。②是水篆的形体。③是楷书的写法。

《说文》：“支，去竹之枝也。从手持半竹。”张舜徽先生认为，所谓“去竹之枝”，就是“去其旁小枝条而后可用”。所谓“手持半竹”，就是手（又）拿小篆“竹”字的一半之形，即一条竹枝。可见“支”即字实为“枝”字的初文，如《诗经·卫风·芄兰》：“芄兰（一种蔓生植物）之支。”这句诗中的“支”即为“枝”。由“枝条”义可以引申为“分支”义，如《新唐书·骠国传》：“有江，支流三百六十。”

“支”可作“肢”的假借字，如《资治通鉴·汉纪》：“心腹四支，实相悖赖，一物不备，则有阙（缺）焉。”

“支持”一词，今天多用为“支撑”、“鼓励”、“赞助”义，但古代多指“对付”义，与今天用法完全相反，如《元曲选·杀狗劝夫》：“他觉来，我自支持他，包你没事。”这里的“支持他”就是“对付他”的意思。

“支”字是个部首字，但真正属于“支”部的字却极少，《说文》中“支”部仅收了一个字，所以“支”字多作形声字的声符，如“芰”、“伎”、“歧”、“歧”、“妓”、“技”、“翅”等字。《新华字典》删去了“支”部。



中国放弃对日索赔不能归咎于毛泽东

二战后,中国放弃了对日索赔。对于此事责任何在,民间一直众说纷纭。一篇题为《周恩来揭秘:毛泽东基于友好决定不向日索赔》的文章,似乎给出了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并不准确。

此文中引用周恩来的话说,“这是主席决定了,不向日本索赔了。为什么不索赔呢?实际上因为我们中国也吃过赔款的苦头,赔款都是从老百姓的腰包里取出来的……尽管到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他们经济已经开始好转了。但是赔款毕竟还得从日本老百姓的兜里拿出来,是在加重老百姓的税赋。”文章还说,“当时周总理还在我们内部讲过,实际上日本赔给印尼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赔款,都是一些物质赔偿。而且都不是拿最先进的东西来做赔偿的。比方说铁路也不是新的,都是把旧的东西重新刷一刷,修补修补就算了。人家把破旧的东西赔给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以次充好给你,没多大意思。所以主席便

决定不要赔款了。”

先有美国高压,
已迫使台湾放弃对日索赔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力求尽可能多地获得日本赔偿。这种要求初始时尚获美国支持,但随着国民政府在内战中的失败,美国为加强日本、防范苏联,遂高压迫使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放弃了对日索赔权。尽管大陆一再声称不承认此事,但从务实外交的角度来看,这一“既成事实”,是日后“中日关系正常化”谈判所无法回避的。

○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获美国支持,曾从日本获得价值2250万美元的实物赔偿

依据1945年7月发表的《波茨坦公告》,日本的赔偿原则为:“日本为支持其平时经济及交付公正之实物赔偿,得维持必要工业,但不得维持能使日本再武装之工业。”因为“一

●史料钩沉●

战”后,战胜国对战败国剥削过甚,导致了希特勒上台等一系列不良后果。同盟国为免重蹈覆辙,将对德、日的索赔限定在一个范围内,不伤害它们维持自身发展的力量。同盟国设立远东委员会,负责日本问题的处理。

国民政府提交的数据显示,自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至日本投降为止,

中国因战争死伤人口1千余万,公私财产直接损失313亿美元,间接损失204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在东北、台湾和海外华侨所受的损失。中国政府要求至少获得日本赔偿总额的40%。随后,盟国将一批日本的军事设备按照3:1:1:1的比例,先期分配给中、英、荷、菲四国。自1948年1月至1949年9月,中国共从日本运回赔偿物资125004箱,3561276吨,约值2250余万美元。此外,中国于1947年4月从日本获得了18艘军舰。

○随着国民政府在内战中的失败,美国转而支持日本,竭力压迫台湾放弃对日索赔

由于远东委员会各成员国为赔偿的分配方式争论不休,以致向日本索赔的全盘计划迟迟无法敲定。在几年的争执后,中国内战接近尾声,国民政府败局已定。再加上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调整“冷战”战略,将原本依仗中华民国防范苏联的计划,改为全力扶植日本,让日本成为抵御共产主义的桥头堡。

1949年12月,美国总统杜鲁门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谈后,通过“亚洲形势报告”,决定



1972年9月2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构建自由主义国家联合体”,指出美国要强化与日本、冲绳和菲律宾的关系,给予它们必要的经济、军事、政治援助,与亚洲非共产主义国家合作构建地区联合体。基于复兴日本经济的目的,美国必须说服同盟国减免日本的战争赔款。

1950年10月,“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约见美国对日和谈首席代表杜勒斯时说:“日本多年的侵略和占领使中国政府和人民遭受极大的损失,要中国完全放弃赔偿的要求是困难的。”“我们不想为了赔偿加给日本以难于忍受的经济负担,但中国政府和人民理应得到适当的补偿。”杜勒斯回答:“按照美国政府的意见,赔款应该豁免。”“为了使日本成为自由国家的一员,它的经济必须恢复,并置于一个能够存活的基础之上。自从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美国已在日本投下了二十亿美元,美国不能继续那样资助日本。美国人民不能容忍那种做法,即把钱投入日本,然后让一些盟国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它拿走。”美国这就回绝了台湾方面要求与日本予以战

争赔偿的合理要求。

顾维钧与杜勒斯谈话后一个月，美国向其他盟国通告了“对日媾和七原则”，其中即包括“和约签字国放弃对日本的全部赔偿要求”。1951年7月，美国发出了召开旧金山对日和会的通知。全面退居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为延续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作为中国的“正统政府”参加对日媾和，被迫对美国做出让步。“外交部长”叶公超指示顾维钧说：“关于放弃赔款问题，我愿从美方主张。”即便如此，由于苏联、英国的反对，台湾方面还是未能如愿参加和会。同时，美国又不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这就导致了旧金山对日和会上，竟然没有中国代表。

○为保持和美国、日本的同盟关系，台湾方面最终忍痛放弃对日索赔权

《旧金山和约》规定“日本应对它在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和痛苦给以赔偿”，但“日本的资源目前还不能够全部赔偿这些损害和痛苦”，所以日本对盟国的战争赔偿只有两项：“一是对被侵占国提供技术性或劳务性补偿；二是日本以及人民在同盟国境内的财产权由该同盟国处置。”同时申明“除本约另有规定外，盟国兹放弃一切赔偿要求”。这就是说，鉴于日本国力有限，各个战胜国事实上只能从日本获得“劳务补偿”。

中国没有参加旧金山和会，需要单独与日本媾和。依据《旧金山和约》，重新获得主权的日本可以选择是与“中华民国”，还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媾和。在“冷战”背景下，日本只能选择后者，站在美国为首的“反共”阵营。已经失去大陆的“中华民国”政府，要保住台湾，除了与美、日结盟之外，也是别无他策。正如

当时台湾内部文件所说，“如果不能签订和约，不仅使我原已低落之国际地位，更受极大之损害，且我于和约后之日本贸易关系及经济合作等实际问题，亦将无法解决，而于台湾之发展，自多不利。”

在美国压力下，台湾当局与日本在1952年4月签订了《中日和平条约》(所谓“日台条约”)。条约规定了如下几点：“甲、政治重于经济；乙、主权与国际地位重于一时的经济利益；丙、中日两国关系重于其他国家关系；丁、劳役赔偿可以不争；戊、平等互惠关系条件应予除去。”“中华民国”政府为了加强与日本的关系，将《旧金山和约》中规定给日本的“劳务赔偿”也一并放弃了。蒋介石此举确实称得上是“以德报怨”，但这不是主动为之，而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毫无疑问，美国在战胜国对日索赔问题上发挥了不好的作用，如南开大学学者林乔生指出的，“美国的日本赔偿政策，从属于美国的东亚战略，是其自身国家利益的根本体现。而且，美国作为对日赔偿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与主导者，出于私利，未能代表盟国彻底追究日本的战争赔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战胜国放弃对日索赔，加之大力援助，使日本经济很快恢复过来，达到了美国抵御共产主义的目的。

再有田中角荣强硬发话：

要求赔偿立即回国

考察大陆自49建政以来对日索赔的基本态度，要注意两点：一方面，为拉拢日本，大陆曾多次主动提出放弃对日索赔；另一方面，

●史料钩沉●

日本以“日台条约”为筹码，多次放言逼迫大陆放弃索赔，如田中角荣即有“如果要求赔偿就立即回国”之言。

○为向“日本人民”示好，周恩来等人1949年后曾一再表示，不会追究赔款问题

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没有任何官方往来。中国力图区分日本人民与日本军阀，希望通过民间外交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为了表示善意，中国领导人一再表示可以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建政之初，审判日本战犯的时候，周恩来说到战争赔款：“这个款，不要赔了，赔款还不是日本人民的钱，政府还能拿出钱来吗？”

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确立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中日复交前中共对日工作的框架。中央在文件中“声明取消战争状态和宣布日本免付赔款的时间不宜过早，要表示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前不能正式解决，但我方愿意解决该问题。”这说明，最迟到1955年，中共中央已经做出了放弃对日索赔的决定。1956年，日中友好协理首任会长访华时，周恩来又说：“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中国丝毫无意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

除了表示友好外，中国领导人做出放弃对日索赔的声明，也是出于对当时国际局势的分析。二战后不久，美苏英等国相继放弃向德国索赔。到了1955年，苏联宣布放弃向日本要求赔偿的权利。处在蜜月期的中苏两国，又一同发表了《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声明》，在对日索赔问题上，中方当然要采取与“老大哥”一致的步调。

1964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再次表示，对中国来说，实现邦交正常化是头等大事，赔偿问题绝不会成为妨碍中日邦交的障碍。

○更关键的一点是：田中角荣访华前，已打定主意，“如果要求赔偿就立即回国”

1964年2月，法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国会讨论有关对华政策说：“如果事态发展到北京政府作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受到祝贺的话，日本也必须考虑邦交正常化问题。”作为建立邦交的条件，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了以下四点要求：承认日美安保条约；尊重日台条约；放弃对日赔偿请求权；保证不干涉内政等。

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获得联合国合法席位。1972年7月初，田中角荣出任首相，开始着手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假冒“特使”访问北京，探寻中国方面的意向。会谈中，竹入说到赔偿问题时，周恩来表示：“毛主席说放弃赔偿要求。如果要求赔偿，负担就会落在日本人民身上。中国人民对此有亲身感受。清朝时赔给日本2亿5千万两白银。清朝因此提高了税额。不知道这些钱是否都支付了。给八国联军的赔偿是4亿到5亿两白银。4亿美元左右，现在不是什么大数额，但让人民负担不好。联合声明里也可以写上放弃要求赔偿权。”“赔偿问题已经解决，日方只要向中方说一声谢谢就行了。”不过周恩来说，“中方不是因为所谓的‘日台协定’中，已经提及放弃赔偿，中方才不要求赔偿的。中方从来不承认‘日台条约’。”

周恩来向竹入提出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中

方原始方案。根据竹入记录,其中第七条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日本国放弃要求战争赔偿权。”竹入回国向首相汇报了这个情况,田中角荣听后半信半疑。直到踏访华之旅时,田中依旧是抱着一种要中国“当面确认”、“如果要求赔偿就立即回国”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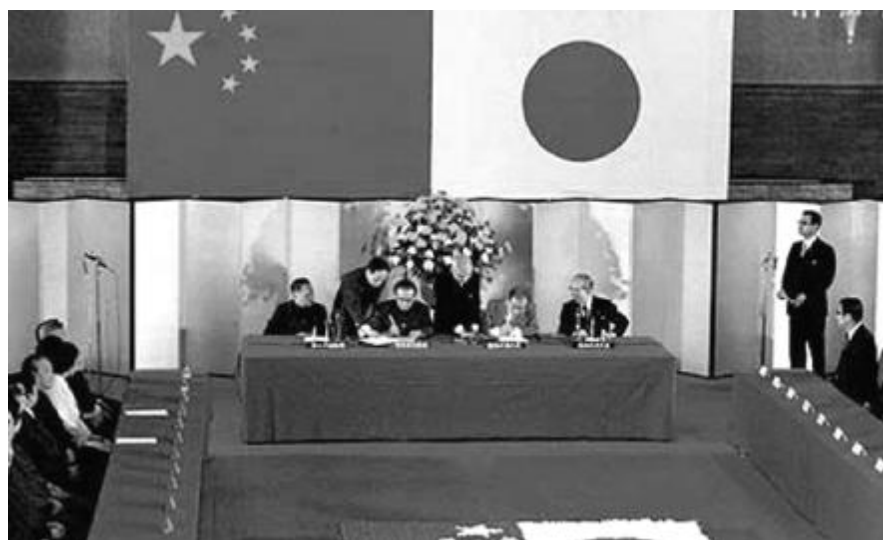
所谓“为中日友好放弃索赔”, 应视作一种体面的外交说辞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访华。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益郎在会谈中说:“联合声明中不必再提赔偿问题,因为它从法律上讲已经解决了,日台条约中已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也就是说,日本方面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延续“中华民国”政府放弃对日赔偿的承诺。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可所谓“日台条约”,那就意味着变相承认,自1952年以来,台湾的“中华民国”一直代表中国。因此,这个要求是中方不可能答应的。

周恩来就此对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说:“我们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双方;如果只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周恩来还进一步指

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五十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法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换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可以放弃对日索赔,但与“中华民国”和“日台条约”全都无关。

虽然周恩来口头上一再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放弃对日索赔与“日台条约”无关,但事实并非如此。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中央下发内部文件,解释放弃对日索赔的三点原因:(1)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的要求,中



1978年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
互换仪式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

●史料钩沉●

国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2)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央关心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3)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世代友好下去的愿望。

以上三点概括来说,中国政府是以放弃对日本索赔为条件,一方面促使日本尽快对台断交,一方面获得日本民间好感,促使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蒋介石对日本有所谓“四大德政”,也就是:1、让 200 多万日本军民平安返日;2、阻止列强如瓜分德国一般瓜分日本;3、保留天皇制度;4、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基于这个原因,日本国内有一批反共、亲台的政客,他们极力反对背弃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如果坚持让日本支付战争赔款的话,无疑会给亲台势力以“反共”理由。

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则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从此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关系和扩大人员往来,根据需要并考虑到已有的民间协定,同意进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在排除了赔偿问题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终于实现。

总之,中国政府放弃对日索赔的过程相当复杂,若一定要寻求一个“罪魁祸首”,在美国高压下签订的“日台条约”,可谓关键转折点。

真实的『赤壁之战』

双方兵力悬殊不大

赤壁之战,曹操究竟有多少兵力?曹操自己说八十万,那是虚数。古今史学界无一认同此数。

曹操南征荆州时,从十五六万北方军人中抽调出步兵八万人、骑兵万余人,但调集来南征的军队没有全部都参战。旱路运输限制了出战的兵力。在一条线上,上限兵力只能是五六万,超过此数,不仅道路拥塞,后勤也无法保障。

至于荆州兵,总数或许可达七八万,但长沙、桂阳、零陵、武陵等南四郡仅仅被抚定,曹军从来没到过那里,所能动用的就是集结在襄阳等地的二万余人。

随后,曹操又留徐晃驻扎樊城,令曹仁镇守江陵。如此算来,东征进抵赤壁的曹军总兵力约七万人。

对于孙权方面,基本一致按照《三国志》的明确记载,是孙权给了周瑜三万人马参战,而对于刘备方面,则多数以诸葛亮自己说刘备一万加刘琦一万合计两万为准。大致上均认为是孙刘联军五万人参战。

以五万抵抗七万兵力,人们普遍认为赤壁之战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例属实,但双方兵力对比并不十分悬殊。

“草船借箭”是借来的故事



诸葛亮不曾有过“草船借箭”的事。但“草船借箭”也并非空穴来风,据《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有关记载,建安十八年(公元 213),即赤壁之战五年后,曹操率大军南下进攻孙吴。孙权领兵迎战,两军战于长江水入巢湖的濡须口。一天,孙权借江面有薄雾,乘轻便战船从濡须口闯入曹军前沿,观察曹营部署。曹操生性多疑,见江面水雾缭绕,孙军整肃威严,恐怕有诈不敢出战,下令弓弩齐发,箭射吴船。孙权的船很快便落满了箭,船因一面受箭偏重,渐渐倾斜即将翻沉。孙权命令掉转船头,让另一面受箭,等受重平均,船身平稳后,孙权指挥战船列队,缓缓离去,曹操才明白上了当。

这只是发生在孙权身上的一个故事,仅仅是急中生智之举罢了。他并没有计划“借箭”,史书中也没说是草船。

“周瑜打黄盖”子虚乌有

三国历史上并没有黄盖使用苦肉计,但诈降确有其事。黄盖为保证无武装的火船不被截击而能够顺利地接近曹军水寨,便向曹操投书诈降。《江表传》记载了黄盖的诈降书,他在诈降书里认为:以江东地区六个郡的兵力,不能够抵挡中原的一百多万兵力,但是孙权、周瑜执迷不悟,妄想抵抗,所以,他情愿向曹操投降。

曹操很轻易地相信了黄盖的投降,是因为曹操认为,黄盖曾经做过孙坚的部下,资格比周瑜老,屈居在周瑜之下,很可能心有不甘。此外,十几年来各方的将领背弃原主而投降曹操的太多。曹操受降成习惯,因此没有太多怀疑。

此外,周瑜的同郡蒋干被曹操派去说服周瑜也确有其事,但并非在赤壁之战中。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把它记在赤壁之战后,并且只有蒋干劝降,没有中周瑜的反间计。而蔡瑁、张允也没有被卷入其中,他们甚至压根就不是曹操的水军都督。





西安城门趣闻(二)——永宁门

(西安城南城门,位于南大街南口)

1.安定门沿用隋唐皇城顺义门

安定门原为隋唐长安皇城西面中门顺义门。建于隋开皇二年至三年(公元582—583),中以横街(今西大街与东大街西段)与皇城东面中门景风门东西相通。唐末天祐元年(904年),韩建以皇城改筑为新城,封闭了原皇城西面偏北门安福门,而保留了此顺义门为唯一的西城门,历五代宋金元时期。明初以唐皇城为基础拓筑改建西安城时,仍以此顺义门为西城门,但改门名安定门。如同南城门永宁门一样,改隋唐过梁式三门洞为砖砌拱券式单门洞,城门楼亦按西安四城门统一形制,改建为歇山式二层三重檐建筑。

2.安定门内唐大理寺

安定门内北侧,唐时为皇城内大理寺所在地。

大理寺为唐朝中央最高司法审判机关。置长官大理卿一人,从三品;次官大理少卿二人,从四品上。另有正、丞、主簿、司直、评事等。大理卿之职,掌折狱详刑之事。凡诸司解送犯徒以上罪,百官九品以上判免官罪,百姓判流刑死刑以上罪,皆由本寺详审定罪并送刑部复核。重大疑狱则由本寺与御史台、刑部组成三司会审。大理寺署在京师皇城第四横街之北靠近西城墙与西城门顺义门处,旧址约在今西安西门内北侧飞跃巷至儿童医院之间。

3.安定门外尉迟敬德宅

尉迟敬德(公元585—658),唐初大将。名恭,唐朔州善阳(今山西朔州)人。隋末从军,骁勇善战,以功授朝散大夫。后为刘武周偏将,败降归唐,授秦府统军,参与玄武门之变,

贞观中拜右武侯大将军，名列凌烟阁，进封鄂国公。据其墓志铭载，居宅在今安定门外南侧唐布政坊。

4. 安定门外唐祆祠

今安定门外南侧唐布政坊，曾设有两所祆祠，即祆敦寺院。祆教是由波斯(今伊朗)传人唐朝的琐罗亚斯德教名。因该教崇拜火，故中国人又称其为火教、拜火教、火祆教。该教以《波斯古经》为经典。主张善恶二元，认为火、光明、清静、创造、生是善端；黑暗、恶浊、不净、破坏、死是恶端。崇信光明，反对黑暗。唐长安布政坊有祆祠两所，一在布政坊西南隅，称胡祆祠，武德四年(公元 621)立。祠内有萨宝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充其职。另一所原在醴泉坊十字街南之东，称旧波斯胡寺。仪凤二年(公元 677)，波斯王毕路斯奏请设立。景龙(公元 707—710)中，中书令宗楚客在此筑宅，“寺地入其宅”，遂移寺于布政坊西南隅胡祆祠之西。长安城另有普宁坊西北隅、靖恭坊十字街南之西、醴泉坊西门之南祆祠三所。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 845)毁佛时，祆祠亦遭废毁，教徒被勒令还俗。

5. 西门瓮城甜水井

老西安人都知道，西门瓮城有两口大井，水质清澈而水味甘甜。过去在街头也能常常看到，拉着西门瓮城井水的大车小车走街串巷的卖水人。

西门瓮城第一口老井开凿于清康熙(1662—1722)初年。当时陕西巡抚贾汉复主持疏凿西安城引水渠道，有一位善识井脉的工匠，在仔细踏看后，建议在西门瓮城内东北部开凿大井。大井开凿后，果然“水甘而旺，遇旱不涸，足资汲饮”(《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古

蹟》)瓮城井条)。但也说此井是明代秦藩王令开凿的。清嘉庆七年(1802)，长安知县费浚复修掏此井。道光(1821—1850)中，长安知县胡兴仁在井旁竖一石碑，上刻“井养无穷”四字。井深 16 米，口径 1.6 米。井口为石条砌成的八角井口，上置轱辘木梁，水工以轱辘汲水而上。

民国以后，由于西安人口日渐增加，于是在瓮城系北部老井之旁又开一新井，“水亦甘旺，然比之老井则稍逊矣”。

此两口西门瓮城井，由于水旺味甘，解放以前，一直是西安广大居民的饮水之源。

6. 安定门内明清贡院

今安定门内北侧儿童公园一带，曾是明清时期陕西省举行乡试的考场贡院。明清科举之制，各省于省城均置贡院，三年一大比，届时本省生员(府州县学的学生)与监生(由国子监肄业者)等，会集省城，参加乡试于贡院，考中的称为举人。西安贡院建于明景泰(1450—1456)年间。贡院号舍原为席棚，嘉靖四年(1525)悉易为木，又拓筑数百间，筑内外缭垣。贡院内有五星堂、明远楼、至公堂、聚奎堂、主考厅、五经房等建筑。清雍正元年(1723)，陕西巡抚葛世图续建加固号舍，改筑为瓦砖房。《咸宁县志·建置·贡院》(康熙)称其“堂舍规度宏丽森严为天下第一，名公题咏甚富”。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因科举制度停罢，贡院随之而废。今西大街西段北侧西门附近的贡院门街及东、西举院门巷，皆因在昔贡院附近而得名。

7. 解放军攻占西城门

1949 年 5 月 18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十七师奉命进攻西安，以粉碎

国民党胡宗南部逃离前对西安的破坏。19日拂晓,解放军从驻守的陕西三原县出发,急行军100余里,于5月20日凌晨零点左右赶到咸阳附近集结,并连夜抢渡渭河,向西安奔袭。

渡过渭河后,时十七师四十九团沿西兰公路东进,消灭了驻守在三桥镇的守敌,进逼至西安西关准备攻城;五十团沿西兰公路以北,准备占领西安城北火车站。当日上午10时,四十九团战士已攻至西安西门城下,当时西门城门紧闭,驻守在城墙上的国民党自卫队向城外打枪,双方交火后,解放军尖刀连战士不顾一切冲至城门,用炸药包将瓮城门板炸开一个大洞,战士们呼喊冲杀进攻,占领了西城门,国民党自卫队见大势已去,停止了抵抗,缴械投降。接着解放军大队进入西城门,并立即分遣部队占领北城门、南城门、钟楼和西关飞机场。与此同时,其他团解放军战士也按原计划占领了火车站、发电厂和东城门。5月20日中午12时,红旗插上市中心钟楼,西安获得了解放。

红埠街： 长安皇城内第一横街

◎ 张奂雅

东起二府街西口,西至教场门和北广济街的交会口,有条长三百多米的街道,这便是居住过许多名人的红埠街。而现在红埠街所在的位置,在隋唐时也是长安皇城内的第一横街的所在地。

在止园建成前,杨虎城将军一直在红埠街居住。据老住户回忆,当时杨虎城的府邸就位于红埠街54号。房子有正偏两院,总共三进深。除了居住过杨虎城、孙蔚如等名人使红埠街名声大噪之外,在隋唐的历史中红埠街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据传在公元582年,隋文帝派员四处寻找理想的新都地址时,一天恰巧路过红埠街附近,那里有个名为杨兴村的村庄吸引了他的注意。由于隋文帝姓杨,在前朝又自号大兴宫,于是觉得这里是块天赐的风水宝地,而且杨兴村地界宽敞、避风向阳,地势也具有一定优势。最终隋文帝决定新都以杨兴村为中心建造,并将新都命名为大兴城。作为大兴城中心的承天门,其遗址就位于今天红埠街中段北侧莲湖公园南墙的高台。

隋唐长安城皇城内的第一横街也位于红埠街,承天门前的广场就在这第一横街上,后经测量,皇城第一横街宽度达440米。如今我们不难想象当隋唐举行庆典时的恢弘场景。唐末以后皇城改建为新城,宽阔的第一横街街北也逐渐被民居所占据,只留下街道的南半部分继续使用。

行至明代时,红埠街是中所坊第八小街,清代名为红阜街,直至民国初年才改为红埠街。而关于红埠街名称的来源,专家猜测与清代红阜街有关,意思是“红色的土山”。据考古资料显示,唐皇城第一横街北临宫城和皇城之间的城墙曾被烈火烧过,之后颜色就呈红色,到了清代,这里依然保有唐代火烧后留下的城墙遗址土堆。

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

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位于西安市主城区东南部，南依秦岭北麓，北接西安主城，距市中心钟楼 7 公里，距绕城高速公路 2.8 公里，与西康高速紧邻。总规划面积为 86.68 平方公里，其中一期规划区 23.04 平方公里，二期规划区 63.61 平方公里。

成立于 2006 年 11 月 30 日，是陕西省政府、西安市政府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依照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共管的国家级高科技园区，是西安市“五区两基地”之一。2007 年 12 月 26 日，“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获得

国家发改委批复认定。2009 年 4 月，西安航天基地被陕西省政府批复为“陕西大功率半导体照明产业基地”。2010 年 6 月 26 日，被国务院批复为国家级陕西航天经济技术开发区。

截止 2012 年底，以航天及军民融合产业、卫星及应用产业、新能源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四大产业集群初步形成，成为陕西省和西安市做强工业、实现新型工业突围的重点区域。在建以及前期筹建项目为 93 个，总投资约 780 亿元，其中，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数量和投资量均超过三分之一。

·解字·

“反”



①



②



③



④

“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个“反”字本为会意字。①是甲骨文的形体，左边为“厂（厓）”，右边为“又（手）”，表示用手攀援山厓而上之意。②是金文的形体，与甲古文相似。③是小篆的写法。④为楷书的形体。

《说文》：“反，覆也。”其实，“覆”并不是“反”字的本义，而是引申义。“反”字的本义是“攀”，在经传中常写作“扳”，比如《礼记·丧大记注》中的“攀援”就写作“扳（反）援”。可见，“反”就是“扳”字的古文，是“援引”、“攀登”之意。由“攀登”可以引申为“翻转”，如《荀子·非相》：“定楚国，如反手尔（耳）。”由“翻转”可以引申为“相反”，与“正”相对，如《庄子·秋水》：“知东西之相反”。至于“春往冬反”（《韩非子·说林上》）中的“反”却非“相反”义，而是“返回”义，在这个意义上，后世均写作“返”。请注意：《荀子·儒效》中有这样一句话：“积反货而为商贾。”所谓“商贾”就是商人，“反货”就是“贩货”，可见，“反”字可作“贩”字的通假字，所以，这里的“反”必须读作 fān，而不能读为 fǎn。

长安浣峪口老油坊榨油技艺

(乌云高娃 整理)

浣峪口老油坊位于长安区滦镇街办辖内的浣峪口村西。创建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据文物部门对油坊土板墙、地基以及油梁的磨损程度鉴定,认为距今已有 120 年以上的历史,是西北地区现存规模最大、年代最久、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手工榨油作坊。其榨油方式延续了明清时期的立式(我国现存古代榨油术多为卧式)榨油方式,以河水为动力,利用杠杆原理工作,从采集原料、磨胚、蒸胚、包坨、压榨、沉淀成油等共 30 多道工序,榨出的油质纯、色亮、口感好,堪称民间手工榨油技艺的“活化石”。

清光绪十三年(1887),留日归来的斗门镇齐一礼先生,相中了秦岭北麓凤凰山脚下的浣河北岸,在这里创建“西北纺纱局”,以纺纱为主、榨油为辅。老油坊据说当时还是洋务运动的产物。齐益礼十分注重技术创新,榨油的步骤和工艺十分严格,又以浣河水为动力,利用杠杆原理操作,大大提高了榨油效率。后因榨油利润远大于纺纱,改为以榨油为主,纺纱为辅。齐一礼去世后,榨油厂由张倍亮、董振友等继续经营。至 1959 年公私合营,老油坊变更为一个拥有 9 个人和 16000 元资金的集体企业,名称改为滦村人民公社油脂加工厂。改革开放后,老油坊由现在的经营者高让

让师傅承包,改名为浣峪口老油坊,经营至今。其榨油技艺经四代人薪火相传,得以传承。

一、采集原料

1.选料:选择菜籽时“宁选新不选陈”,以黄土地种植的新菜籽为上乘,榨出的油色亮、质纯,口感好。

2.晾晒:晾晒是非常关键的工序,以菜籽呈松散片状为最佳。太湿、太干都不可取,如出现出油状,就不能再用。

3.去尘、去杂:用扇车(一种过去流传下来的传统农具)先除去尘土,再用筛子、簸箕等工具去除杂质(沙、土、材、壳)。

二、磨胚

1.将选好的菜籽倒入石磨的斗牛(石磨有很多种,根据不同的原料用不同的磨,磨菜籽用拐齿石磨),开动石磨(石磨用水轮驱动,也叫水磨),斗中放有竹签,用来调节石磨进料的快慢,菜籽要磨成泥状,越细越好。

2.将磨好的胚进行干湿度鉴别,由有经验的师傅用手抓胚,成团状、有膨胀感为合适,既不可太干,也不可太湿。

三、蒸胚

准备一口大锅,加水至锅高度三分之一处,将水烧开,顺锅沿将磨好的胚用铁锨撒到

蒸笼上,盖住缝隙冒上来的蒸气,哪里冒气就给那里撒胚,直到将胚均匀放完,到气上来均匀后,将做好的油草按顺序进行覆盖。在覆盖的过程中要将油草上的绳子放在锅沿上,以便于蒸好后取草方便,不至于烫手。从盖草起用大火蒸 40—60 分钟,蒸胚一般一次能蒸 360—420 斤。

四、包坨

把蒸过的油草理顺,嵌入油圈中,将蒸好的菜籽胚装入其中,用“木拐”(用硬杂木制作成榔头状的工具)夯实,用油草将菜籽胚上部包裹严实,踩实。

五、榨油

用滑车将油梁吊起,将包好的油坨垒好放到出油井里,第一次放入四个坨,将最上和最下两个坨上的圈拿掉,将剩下的两个圈放在总高度的平均位置,用四个立柱将其固定,给最上面放置盖板,盖板上放置支架(即油梁的支点),逐渐松开滑车,用油梁加压。使用的过程要“紧包坨,慢使梁”。将压过的坨取出,粉碎,再进行一次压榨,经过两次压榨基本可将坨内的油压榨干净。

六、成油

榨出的油经油坨下的石槽流入油缸内,将油过滤、沉淀 15—30 天(冬天长,夏天短)后,杂质与油分离,即可出售。

另外,在榨油工序中还有两个辅助工序亦很重要:一是制作油草。在榨油的过程中,油草是非常重要的工具之一。光绪年间使用的是出自秦岭山区的龙须草,人民公社初期改用蒲草,后期改用稻草。所选草得高度为

100—120 公分,不能霉变、腐烂。之后“通草”,即将选好的草晒干去叶,用“猪蹄扣”(一种传统的捆扎方式,这种方法捆扎会越拉越紧)扎成直径 30 公分左右的小捆,将根部削成椭圆状。然后进行“烫草”,先将草捆根部放入沸水中,再整体放入浸泡 1 分钟左右。晾成半干,冷却后将猪蹄扣再次拉紧,拉力约 1 吨左右。最后进行冲洗,晾干。二是制作油圈。油圈用竹皮编制而成,为直径 50 公分,高度 10 公分的圈状,中心部向外凸出。

2009 年 5 月,长安沔峪口老油坊榨油技艺入选西安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9 年 6 月,长安沔峪口老油坊榨油技艺入选陕西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油坊室内全貌及油梁

季羨林 三辞桂冠



一辞“国学大师”

季老的请辞理由——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莫十几二十年前……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

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季老的请辞理由——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 10 年，在国内 57 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季老的请辞理由——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年来年

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羨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 13 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



朱自清的 『三此』 观

1924年3月2日,朱自清来到浙江虞(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春晖中学任国文教员。

为培养学生“自立的、个人的”人格目标,朱自清经常勉励学生“自觉的努力,按着明确的步骤去努力”,各种知识的学习都是如此。在国文方面,首先应切实地学会各种应用文和养成欣赏力,但“初级中学国文教授,当以练习各种实用文,即练习从各方面发表情思的方法为主,而以涵养文学的兴趣为辅”,因为前者是自立的基础本领,指出“事情已过,追想是无用的,事情未来,预想也是无用的;只有在事情正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把握它,发展它,改正它,补充它,使它健全、谐和,成为充满的一段落、一历程”。他把这叫“刹那主义”,或者叫做“三此”——此时此地此我。在朱自清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学生学习颇为用功,学业进步很快。春晖第一届初中毕业生中就有8人留学日本,除了别的因素,应该说,他们经过春晖的3年学习,已具备了相当的



自立本领,亦即健全人格的基本要素之一。

朱自清笃信“教育者和学生共在一个情之流中”,“纯洁之学生,唯纯洁之教师可以训练”。自然,朱自清的处世态度极其严肃认真。正如他清华大学同事、著名作家李广田所说:“他有客必见,有信必回,开会上课绝不迟到早退。凡是公家的东西,绝不允许别人乱用……”这般方正随和、温文敦厚之人,自让人叹服,并乐于与其交往。

在春晖,朱自清更是一反“师道尊严”的传统,要求学生克服见了老师就“矫情饰伪”的毛病,培养做人“纯正的趣味”。朱自清如斯说,亦如斯而行,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放下架子,和学生平和地讨论。当教育传达出对学生的善意、信任和关爱时,唤醒的是学生的向学之心和向善之志。当学生获悉这得益于朱自清时,他们的感激之情自无以言表。每每对着朱自清转身留下的背影,心中都会涌起一份特殊的感动。



趣谈中国古代房地产买卖

房地产不是今天才有的，有了私有制就有房地产买卖。当然，今天的房地产业算是登峰造极了，土地还是国有的，价格却炒得高高的，还不能投资。今人比古人玩得洋。

古代买块地多少钱呢？《野客丛书》里写了东方朔一句话：“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价亩一金。”这里说的是汉朝长安附近，最熟的地皮了。汉朝所谓一金，是指一斤金子，折算差不多一万铜板，折成现在的钱，四五千元人民币吧。一亩地是 660 多平方米，合着七八十元一平方米。这个价钱还有很多记载证实，比如“厥土之膏，亩价一金”、“祖业良田，亩价一金”。汉朝大概就是这么个价钱。

到了宋朝，房地产交易就活跃了。不仅能拿钱买，还能拿东西换。《铁围山丛谈》里说，书法家米芾想在江南丹阳置个大宅子，到处找人打听。他一哥们儿呢，则惦记上米芾手里的一件宝贝了。什么东西啊？一方砚台。这砚台叫砚山，原来是李后主的，一尺多长，前有

手指粗的“山峰”三十六座，两边是坡，中间凿成研池（指砚，亦指砚心），反正是好宝贝。于是呢，这位就帮着米芾薅摸（*xuemo* 词义：〈方言〉寻找、查找地方），终于找见甘露寺下临江的一块古墓，据说是晋唐时人的住所，背山面河风景好，还有好多参天古树。这之后，就召饭局了，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高兴，米芾就拿砚台换了这块地，后来在这里造了个大宅子，起名叫“海岳庵”。

现在拿砚台能换房子吗？要真是找着李后主那方，没准也行。但这东西估计落不到文人手里。米芾交给哥们儿那方砚山，后来也被宋徽宗收走了。

清朝笔记说，当时有人发现了宋朝的土地交易合同，是这么写的：大宋国江都县太平乡某地，今将钱财九万九千九百九十贯，就着皇天父、后土母、三十八将灵祇，买得丁地坟山。天地神明面前交割清楚。见人东王公、西王母，保人张陆、李庭，书契人石度、金度……

●文史拾趣●

最后还来了一句：“急急如律令”。

这份神神叨叨的地契，挺让人怀疑的。将近十万贯买块墓地？那可赶上现在的物价了。后来又有人找到宋朝的书，发现上面有记载，说买墓地一定要用买地券，是用木头做的，写着红字，实际价格多少再论，买地券上一定要写上九数，比如“九千九百九十九文”（这又太便宜了）。还有人发现了晋朝的买地券，只不过价钱写的是“四百万钱”。看来这一类的地契还不是真地契，只是一种形式，或者是一个告慰亡灵的物件。

真的地契也有，《容斋随笔》里就提到从东晋以后，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皆有文券。不仅有契约，还有交易税，“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税率是百分之四，比起现在的百分之二十来，还是仁义得多了。这笔钱，由卖家出三百，买家出一百，大家都有份。即便如此，也有很多人认为官家索取过多，而且这些税名义上双方交，实际上“皆买者独输”。为了避税，交易数额比较大的，就得想办法了，“率隐灭价值”，故意在契约上隐瞒价格，搞起了阴阳合同，和现在的状况一样。于是，相关的诉讼纠纷也就多了。

清朝的学者俞樾写道，在清朝，买卖田宅的契税，都由买者缴纳，和宋朝相同，但按照晋朝、宋朝的制度，买卖双方都要出，而且卖家比买家出得多，“不可解也”。他要是活到现在，就知道没什么不可解的，制度归制度，变通归变通，市场决定一切，到税务所一看就明白，你的你出，我的你也得出。

以上，都是民间的房地产营生。那么官员呢？他们能住什么样的宅子？唐朝的官员，

住的就比较典型。唐朝初年，提倡节俭，魏征这样的高官，也就住在陋室之中，唐太宗要给他修大宅子，他还死活不要。后来魏征重病，李世民赶紧把自己盖一个小殿的木料，拿去给魏征盖房，五天竣工。这房子一直留到开元年间，毁于失火。房子烧掉的时候，魏征的子孙痛哭了三天，士大夫们还纷纷前往凭吊。

再比如，唐高宗时，中书侍郎（相当于国务院副秘书长）李义琰住的也是蜗居，最后病故于“方丈室内”，皇帝很是过意不去，出钱给他造了座灵堂。

可到了武则天以后，皇亲官员就开始奢靡了，个个比着营造豪宅。唐玄宗天宝年间，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赐死，朝廷官员到王家太平坊大宅去搜检，竟然“数日不能遍”，还真是房叔气派。坊间议论，这种拼着比着盖豪宅的行为，叫做“土木之妖”。

即便是安史之乱也没刹住歪风邪气。平定叛乱的郭子仪牛大了，他的住宅里，院子与院子之间得靠车马往来，各个院子里的门房，彼此都不认识，所谓“堂高凭上望，宅广乘车行”。

有天郭子仪出门，看见施工队正在给他盖院墙，他随口说道：“好好筑这面墙啊，别不结实。”那工人放下工具，说：“放心吧，京城里达官贵人的院墙，都是我建的。几十年来，只见主人更换，墙没毛病，都好好的呢。”

郭子仪听了半天没言声，转身上朝，辞职去了。



金圣叹巧联惊四座

才子金圣叹是文坛大手笔，文学成就斐然。不仅如此，还是对联的高手。

某天清晨饭后，照往常一样，到茶馆喝茶，刚坐下，就听近旁桌子周围几个文人摸样的客人谈论对子，其中一个满脸红红的中年人出了一副对联：

“猫伏墙上风吹猫毛动猫不动”。

一慈眉善目的长须老者立即对出了下联：

“鹰立树梢月照鹰影动鹰不动”。

金圣叹暗暗称奇，那边中年男子也说：“你老真是不愧为联中高手，姜还是老的辣，佩服！佩服！”

长须老者捻捻胡须，笑道过赞过奖。不过，我也有一联供大家取乐，说完用手指着盘中月饼说道：

“上素月公饼”。

不过，我有个小小要求，上联指的是食物，所以下联也只能以食物为对。

长须老者说完后，大家一时抓耳挠腮，无一对上。因联中“上素”是“尚书”的谐音，不太

容易对出。才子金圣叹见半天没有动静，就有心帮忙，脱口而说，我倒有一对，接着就说出下联：

“中糖云片糕”。

下联中，不仅“中糖”和官名“中堂”同音，而且云片糕也是食物。非常合乎要求，对仗也十分工整。大家都点头称是。长须老者忍不住回头看看金圣叹，见他一表人才，出言不凡，便热情邀金圣叹一起过来喝茶，金圣叹正觉一个人有点寂寞，故也不推辞，端着茶壶坐到了一起。长须老者朝金圣叹拱拱手说：“想必先生十分精于对句，老夫这里有一对子，可惜多年没有觅到下联，还想请先生出对赐教，不知如何？”

金圣叹本来就喜欢搜集稀奇古怪的对联。这正中下怀，十分高兴地说：“先生不必谦让，快讲出来让我试试。”长须老者抑扬顿挫地说出上联：

“小大子上下街走南到北买东西”。

在座众人，皆以为金圣叹难于对出，怎料金圣叹低头略一思索就说：“有了，我对出来了”。

“少老头坐睡椅由冬至夏读春秋”。

话音刚落，便博得满堂喝彩。长须老者知金圣叹非等闲之辈，便问姓名，方知对面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圣叹。

有趣的数字对联

对联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汉语特有的特殊文学形式。其句式整齐，韵律和谐，对仗工整，含义隽永，感情浓郁。应用于各种场合，为社会各阶层所喜爱，真正体现了整个华夏民族的智慧，是中华文化的精粹。

我国古代对联艺术中的数字联，顾名思义，就是以数字巧妙入联。其构思奇特，独出心裁，别具一格，妙趣横生，深受人们喜爱。

相传苏东坡当年赴京赶考时，就作了这样一副对联：

一叶孤舟，坐着二三个骚客，启用四桨五帆，经由六滩七湾，历尽八颠九簸，可叹十分来迟；十年寒窗，进过九八书院，抛却七情六欲，苦读五经四书，考了三番二次，今天一定要中。

北宋黄庭坚曾被一个少年船夫出联所难。联云：“驾一叶扁舟，荡二双桨，支三四片篷，坐五六个客，过七里滩，到八里湖，离开九江已有十里。”因数字必须与数字相对，且不得以相同数字相对，使颇具文才的黄庭坚也得琢磨良久才对上。联云：“开二人小店，摆一张桌，放七八只凳，来三四买主，喝五两酒，吃六盘菜，付钱十元找回九分。”

相传明朝嘉靖年间，江西吉水有个状元叫罗洪先，自诩有八斗之才。有一次与友人乘船游览长江，在船将到九江时，船夫竟然要与罗状元对对联。罗洪先自以为是联中高手，不屑与船夫交谈，待船夫对联一出口，众人皆面面相觑。联曰：“一孤舟，二客商，三四五六七个水手，扯起七八页风帆。下九江，还有十里。”一

连10个数字，使众文人目瞪口呆，无言以对。直到1959年夏天，广东佛山市的李戎翎才使数百年前罗洪先未能对出的绝联“起死回生”。其所对下联：“十里运，九里香，八七六五号货轮，虽走四三年旧道，只二日，胜似一年。”联中“九里香”是一种木料的名称。

更令人称绝的是清末有位潦倒一生的老秀才为当地两位惨死的背盐工写的数字挽联：

流一头汗，磨两脚茧，饿三餐饭，为四处难，养五口人，爬六县山，恨七沟八滩九道水，九九归一，小寒得一吊钱。

烧九棚炭，背八包盐，放七次排，遭六回险，算五个命，发四季烦，挂三儿两老一堂客，一一积九，大年哭九声天。

古时曾有人在家门口贴了一副与众不同的对联：上联：二二三三四四五，下联：六六七七八八九。横批是：二四七三。这是一副特殊的对联，它是由数字组成的，而且是一副隐字联，上联缺“一”、下联少“十”，利用数字谐音连起来是“缺衣少食”，而横批则是：“儿(2)死(4)妻(7)散(3)”。原来这户人家在利用数字对联向人们诉说社会的黑暗呢！

某地十佛寺联：“万瓦千砖，百匠造成十佛寺；一舟二橹，三人摇过四仙桥。”上联‘万、千、百、十’逐步递减；下联‘一、二、三、四’逐步递增，显示出一种动静相生的自然美。

还有一副歌颂诸葛亮的数字联：“收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头，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想酬三顾。”联中嵌了一至十的数字，写了孔明的十件事，一时成为绝对。后来

有人同样用孔明的生平事迹,用五方‘东南西北中’加上五行‘金木水火土’,对得工整自然:“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里,金木土革爻卦,水面偏能用火攻。”

文人墨客把数字命名的中药巧妙的写成对联,别有一番情趣。

古时候,有一穷秀才在过年的时候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上,上联:“二月兰、三白草、四叶参、五味子;下联是:“六神曲、七叶莲、巴厘麻、九里香。”联中唯独没有用“一”和“十”开头的中药数字联,也就是说缺一少十。细品之,“一”和“衣”,“十”和“食”这不是谐音吗?此联的寓意正是在此,揭露了当时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全联对社会的黑暗不著一字,但是却揭露的入木三分,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无独有偶,清朝末年,某地有一姓陈的药贩子,靠走街串巷赚了不少钱。有了钱就想要权,想过过官瘾,无奈腹中墨水太少,走考状元之路万万行不通。于是挖空心思,花了几万两银子,从朝廷里买了一个“五品官”头衔。虽有名无实,但一有热闹的机会,他就穿上天青色的“五品服”向众人炫耀。有一年春节时候,请人为自己写了一副对联。写春联的人知道他的底细,提笔一挥就写成了“五品青天服,六味地黄丸”。陈某不知是讥讽,便堂而皇之的贴在门前,邻里见之无不哑然失笑。

为什么?肾是人的“先天之本”,六味地黄丸恰恰是滋阴补肾的中药。“肾”与“身”正好是谐音。肾虚意即身虚也。由此可见,这副对联妙就妙在用对比、相承、谐音手法,毫不留情的讽刺挖苦了这个“五品官”的虚荣心,暗中寓意先天不足大写数字,腹内空空,不学无术,巧妙的剥开了“青天服”包裹中卑微的灵

魂,所以说这是一副很有讽刺意义的中药数字联。

清末孙中山留学归国,途经武昌时,闻张之洞办洋务兴实业,欲与一见,便投名刺曰:“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张之洞见用此种口气同他说话,便在纸条上写出一联。让门官交孙中山。联曰: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孙中山旋即写出下联传进去: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张之洞见了,暗暗称奇,立即下令开中门迎接。张之洞在出联中在摆官架子,孙中山在对句中则以“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予以折服。两人之联皆各切身份。

《奇趣妙绝对联》云,郁达夫某年游杭州西湖,至茶亭进餐。面对近水遥山,餐罢得句云:三竺六桥九溪十八涧,一时未得对句。适逢主人报账曰: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达夫以为主人是说对句,经交谈,不禁大笑。三竺,指上、中、下。六桥,指苏堤上有六座桥,即映波桥、锁澜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和跨虹桥。九溪,在烟霞岭西南。十八涧,在龙井之西。因巧合与误会而成联是这副对联的情趣所在。上联全为杭州山水,下联全为食单账目,两联数字对得尤其工整,很难得。

再看现代人以教师为题撰写的一幅楹联:“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晴雨,加上五脏六腑七嘴八舌九思十想,教必有方,滴滴汗水诚滋桃李芳天下。”下联:“十卷诗赋,九章勾股,八索文史,七纬地理,连同六艺五经四书三文两雅一心,诲人不倦,点点心血勤育英才泽神州。”

数字对联是我国古代对联艺术中的数字巧对,虽然只有寥寥的几个数字,如果运用得好,则变化无穷,使人们得到极大的趣意。

西安市区县修志工作研讨会召开

2013年10月30—31日,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召开区县修志工作研讨会。此次会议由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王新中、市县处处长张世民应邀参加。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张帆,各区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区县志主编、业务骨干等会议代表近50人参加研讨交流。

本次会议为了解决目前区县二轮修志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提高修志人员业务水平,紧密围绕区县二轮修志业务展开讨论。会议代表提交论文13篇,涉及人物志编纂、志书总纂、如何提高志书质量、区县志记述深度等论题。交流中碑林区和户县地方志办公室还与大家分享了他们在志书复审、终审以及出版过程中的经验体会和感悟。与会代笔在深入研讨中,积极发言,集思广益,解决了困惑,传播了经验,受益匪浅。王新中副

主任充分肯定了此次研讨会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认为它提高了区县修志业务水平,解决了修志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并进一步推动了西安市区县二轮修志工作总体进展。会上,张帆副主任通报了各区县修志工作进展,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是重申主编职责,要求各位主编做到对修志工作的全程把控和对志稿的全文把关,切实履行主编责任,在“超越前志”上下功夫;二是处理好进度与质量的关系,要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加快进度,既要好又要快,重点在“好”字上下功夫;三是进一步加强各区县间的交流和沟通,通过区县间交叉审稿等方式提升区县志审稿质量,缩短审稿周期,促进西安市第二轮区县志编纂工作的整体推进,确保2015年全面完成二轮修志任务。

市地方志办公室召开领导班子 专题民主生活会

11月26日下午,市地方志办公室党组召开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会议由市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冯艳阳主持,市委第十一督导组副组长姜旭及督导组全体成员到会指导。

会上,冯艳阳主任首先报告了办领导班

子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贯彻中央八项规定情况,查摆了班子在“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表现,剖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了下一步改进作风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并带头作了个人对照检查,查摆了执行政治纪律和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情况存在的

足。随后,办领导班子成员姚敏杰、任昆明、张帜和王莹也都联系思想、工作实际和成长经历,围绕查摆出的问题进行了发言,以整风精神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姜旭副组长在点评中指出,市地方志办公室领导班子以解决“四风”问题为突破口,加强组织领导、细化责任,周密安排,在严格做好规定动作的同时,创新地开展了自选动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基本达到了中央和省、市委要求的聚焦“四风”,反对“四风”,改进党风政风的要求。这次领导班子专题民主

生活会,严肃认真、紧凑热烈,收到共同受教育,提高认识,增强班子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实效。同时,就进一步抓好教育实践活动提出了具体要求。

最后,冯艳阳主任代表办领导班子就抓好整改落实、加强班子自身建设、发挥班子成员带头作用,作了表态发言。下一步,市地方志办公室将以此次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为契机,细化整改措施,建立长效机制,转变作风,真抓实干,以实际行动体现教育实践活动效果,高质量地完成好第四季度收尾工作,确保年度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

2013年《西安年鉴》工作暨培训会召开

11月27—28日,2013年《西安年鉴》工作暨培训会议召开。市地方志办公室全体领导、全市年鉴各承编单位分管领导及年鉴撰稿人120余人参加了会议。

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西安年鉴》常务副主编姚敏杰作工作报告。他首先总结了2013年度西安市年鉴工作的特点,对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针对2014年将要举行的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活动,他要求大家高度重视,积极投入,做好相关工作,确保《西安年鉴》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一是进一步关注民生,使《西安年鉴》真正反映各项事业协调发展,反映人民

群众生产生活状况,为市委、市政府的决策、专家学者的研究、社会公众的需求提供更丰富的资料。二是落实责任,提高年鉴编纂质量。从供稿、审稿两方面严格把关,精益求精,确保年鉴编校质量。三是进一步加强与撰稿单位间的交流和沟通,制定各项工作明确的完成时限表,力争年鉴提前印刷出版。

其间,来自西安日报社、市民委、碑林区志办、市财政局的代表分别就年鉴编纂作了经验交流发言。最后,西安年鉴编辑部负责人有针对性地就年鉴编写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讲解培训。

清朝为什么没有宰相？

清朝设立军机处。军机处原名军机房，前身叫军需房，雍正年间设于内廷，方便皇帝与亲信大臣商议机要。后来逐渐成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

内阁应该是明朝皇帝的秘书处，负责整理奏折，草拟政令。后来基本上执行了宰相的职能。由于军机处的设立，内阁被弱化了。任职内阁的大臣虽然品高位尊，但是实际权力并不高。而实权落在了军机处。

其实，宰相权力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放手程度。

尽管清代军机处是对皇帝完全负责的，但其并不完全是“奴才”。

举一个例子：咸丰驾崩以后，两宫和肃顺的军机处发生了冲突，肃顺采取的对抗措施是“罢工”，军机处无人入值，于是政令因为通路中断而不出宫禁。

虽然军机大臣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是“拟旨”，但是皇帝只是指定原则性、方向性的东西，具体的执行，还是要通过他们的。何况军机大臣一般也要分管各部。所以，他们并不只是皇帝手中传声筒或者打狗棒。

康雍乾三朝，包括后来的慈禧都太强了，所以在他们当政的漫长时期，军机处没有唱主角的份。有清一季，皇帝的高度集权似乎都不需要一个“第二人”——“宰相”的出现。

一问三不知是哪“三不知”？

“一问三不知”的典故出自《左传》。相传公元前 468 年，晋国的荀瑶率大军攻打郑国，齐国害怕晋国强大对自己造成威胁，便派名将陈成子带兵暗中援郑。一日，一部下报告陈成子：“有一个从晋军来的人说，晋军打算出动 1000 辆战车来袭击我军的营门，要全部消灭我军。”陈成子听了大怒，骂道：“出发前国君有令，不要追赶零星的干卒，不要害怕大批的人马。晋军就是出动 1000 辆战车，我也不

能避而不战。你刚才的话壮敌人威风、灭自己志气，回国后我要报告国君。”其部将自知失言，于是感慨说：“君子之谋也，始中终皆举之，而后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意思是说，聪明人谋划一件事情，对其开始、发展、结果三方面都要考虑到，然后才向上报告。而我对这三方面都不知道就向上急忙报告，难怪拍马屁拍到蹄子上，不会有好结果。

“无毒不丈夫” 还是“无度不丈夫”？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是现代汉语中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一句俗语，可这句俗语亦非其原来面目。溯其本源，许多人都认为“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句俗语是由“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讹变而成的。他们认为，“无度不丈夫”中的“度”是指气度，和“量小非君子”中的“量”合起来正好构成“度量”一词，后来在流传的过程中“度”字才被讹传为“毒”。这种解释看似合情合理，其实却是想当然之说，理由有二：其一，“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之说严重违反了汉语对偶句的平仄规律；其二，在明代以前的典籍中找不到相关的书证。

其实，追根溯源，俗语“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是由“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演变而来的，其大体意思是说：对仇人不痛恨的人不是君子，对敌人不狠毒的人成不了大丈夫。在元明清三朝的笔记、话本、传奇、杂剧和小说中，“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句俗语的用例多得举不胜举。如：元·关汉卿《望江亭》杂剧第二折：“便好道‘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元·马致远《汉宫秋》杂剧第一折：“教他苦受一世，正是‘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98回：“常言

说得好：‘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清·李玉《清忠谱》第六折：“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一俗语的产生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自元朝以后，正统的儒家伦理文化、道德价值体系、社会政治及伦理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市井流氓文化急剧膨胀，诸如“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无奸不成商，无谎不成媒”之类带有浓厚流氓文化色彩的俗语在民间大量产生，并被人们广泛使用，而“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就是其中之一。由于这句俗语中所表达的思想与正统的儒家道德思想格格不入，所以在其产生后，正统儒家文化的维护者们试图通过同音替换的方式将“毒”曲解为“度”，为了与“度”对偶，他们又将“恨”替换作“量”，使“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讹变为“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但或许是由于“无毒不丈夫”这句俗语的生命力太强、对人们影响太深的缘故吧，“度”字始终没能将“毒”替换下来，结果就形成了“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句俗语，并流传至今。

不孝有三是哪三个？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自《孟子·离娄上》，是孟子在评价舜结婚的事情时说的，完整的原话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原文的意思是：“不孝顺的事情有三件，其中又以没有子孙后代最为重要。娶妻本应先告诉父母，舜帝没告诉父母而娶尧帝的二女为妻，就是因为担心绝了后代，所以在明理的君子看来，虽然没有禀告父母，就和禀告了父母是一样的。

孟子继孔子之后对儒学的发展有巨大贡献，极力推崇舜的孝行，而且倡导人们努力向舜看齐，做舜那样的孝子。说：“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他甚至设想，舜为天子，而瞽叟(gǔ sǒu)(中国上古人物，汉族，姬姓，因双目失明故称“瞽叟”。)杀人被捕，舜虽不会

利用权力破坏刑律而将其赦免，但一定到监狱里偷偷地把父亲背出来，一起逃到海滨，过无忧无虑的日子，为了共享天伦之乐而忘掉天子的地位。由于儒家的宣传，有关舜的传说事迹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留下极深刻的影响。

后来汉代人赵歧所做的《十三经注》，在注释孟子上面的话时说：“于礼有不孝者三者，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这里把无后解释为了“不娶无子”，从此开始了两千多年的误解。但有意思的是，他认为第一不孝，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意思是：第一不孝是对父母无条件地屈从，容忍他们做不义之事。

这就很值得我们回味了。很多同志说，为了父母去结婚。如果为了父母去欺骗一位异性而结婚，当然也就是“陷亲不义”了，无后问题没解决，反而犯了第一不孝。



中国历史上 影响最大的 10 首诗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有许多诗都有很大的影响，这里所评的是影响“最大”的十首诗，而并非最好的十首诗。因为要影响大，一是要写得好，二是必须通俗易懂、易记。

第一首，李白的《静夜思》



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提到思乡，诗仙的这首诗是所有只要是稍识文墨的中国人第一时间想起的。这首诗明白如话，读起来琅琅上口，表达的是人们普遍共鸣的思乡之情，所以千百年来广为传诵，成了炎黄子孙最熟悉的古典诗歌。不追求想象的新颖奇特，也摒弃了辞藻的精工华美；以清新朴素的笔触，抒写了丰富深曲的内容。境是境，情是情，那么逼真，那么动人，百读不厌，耐人寻绎。无怪乎有人赞它是“妙绝古今”。

第二首，孟郊的《游子吟》



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这是一首母爱的颂歌，诗中真切真淳地吟颂人类最伟大的情感——母爱。尤其是诗的最后两句，以通俗形象的比喻，寄托赤子炽烈的情怀，对于春日般的母爱，被广为传颂。全诗无华丽的词藻，亦无巧琢雕饰，于清新流畅，淳朴素淡的语言中，饱含着浓郁醇美的诗味，情真意切，千百年来拨动多少读者的心弦，引起万千游子的共鸣。

第三首,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
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
萋萋满别情。

白居易的这首诗尤以第二句最为有名,影响最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极为形象生动地表现了野草顽强的生命力,激励了多少辈中国人奋发向前,人不死,奋斗不止。其全诗章法谨严,用语自然流畅而又工整,写景抒情水乳交融,意境浑成,堪称绝唱。

第四首,曹植的《七步诗》



七步诗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这首诗连同这个典故,都广为中国人熟知。曹植运用了十分贴切、浅显生动的比喻表达出自己的情感,并因此逃过一劫。每当再出现兄弟相争时,中国

人都会想起这首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第五首,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欲穷千里目”,写诗人一种无止境探求的愿望,还想看得更远,看到目力所能达到的地方,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站得更高些,“更上一层楼”。这两句诗形象地提示了一个哲理:登高,才能望远;望远,必须登高。这首诗写诗人在登高望远中表现出来的不凡的胸襟抱负,也激励着中国人昂扬向上。

第六首,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此诗写游子思乡怀亲。异乡异土生活的孤独凄然,因而时时怀乡思

人,遇到佳节良辰,思念倍加。诗意反复跳跃,含蓄深沉,既朴素自然,又曲折有致。“每逢佳节倍思亲”千百年来,成为游子思念的名言,打动多少游子离人之心。中国人所特有的佳节思亲就来源于此。

第七首,《诗经》的第一首《关雎》



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毛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诗经》是中国诗歌之始,其中不乏千古名句,尤以第一首广为人知。中国的爱情诗也有很多,其中不乏千古名句,但尤以《关雎》影响最大。每当男人见到美女,想上去追时,“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成了最充分的理由。

第八首,李清照的《夏日绝句》

夏日绝句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女词人李清照这一首慷慨激昂的诗起调高亢,鲜明地提出了人生的价值取向:人活着就要做人中的豪杰,为国家建功立业;死也要为国捐躯,成为鬼中的英雄。爱国激情,溢于言表,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诗人鞭挞南宋当权派的无耻行径,借古讽今,正气凛然。全诗仅二十个字,连用了三个典故,但无堆砌之弊,因为这都是诗人的心声。如此慷慨雄健、掷地有声的诗篇,出自女性之手,实在是压倒须眉了。

第九首,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
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
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
儿女共沾巾。



此诗是送别的名作。诗意慰勉勿在离别之时悲哀。第三联“海内存知

己,天涯若比邻”,奇峰突起,高度地概括了“友情深厚,江山难阻”的情景,伟词自铸,传之千古,有口皆碑。尾联点出“送”的主题。全诗开合顿挫,气脉流通,意境旷达。一洗古送别诗中的悲凉凄怆之气,音调爽朗,清新高远,独树碑石。

第十首,李绅的《悯农》

悯农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这首诗描写劳动的艰辛,劳动果实来之不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感叹和告诫免于空洞抽象的说教,而成为有血有肉、意蕴深远的格言。这首诗没有从具体人、事落笔,诗人选择比较典型的生活细节和人们熟知的事实,道出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劳动果实来之不易。



西安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城市

现西安市区为隋唐时国都,隋开皇二至三年(公元582—583年)建成。初名大兴城,后李渊建唐,改大兴城为长安城,又进一步增修,长安城面积达84平方公里。建筑宏伟壮丽,25条大街宽敞整齐,古罗马城最宽的道路还不到长安城朱雀大街的十二分之一(朱雀大街宽度为150米~155米,见《唐都长安》),除宫城、皇城外,尚建有外廓城,城内有108坊、东西二市,人口百万左右。较今西安城(明城)面积8.7平方公里大9.6倍,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座都城。“它的面积较35平方公里的汉长安城大2.4倍;较73平方公里的北魏洛阳城大1.2倍;较45平方公里的隋唐时洛阳城大1.8倍;较50平方公里的元大都大1.7倍;较43平方公里的明南京城大1.9倍;较60平方公里的明清北京城大1.4倍。同时,也较公元447年修建面积为11.99平方公里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首都)大7倍;较公元800年所建面积为13.68平方公里的巴格达大6.2倍”(引文见《唐都长安》)。唐长安城为以后北宋的开封城和明清的北京城城建规划所参照,同时也为当时日本建平城(奈良)和平安(京都)二京城所模仿。

最早在西安建都的朝代和帝王

最早在西安建都的朝代和帝王是西周的周武王姬发。公元前1046年春,姬发推翻商朝建立了周朝,并在沔河以东建立了镐京,和公元前1052年文王在沔河以西建的丰京(此时为周国)并称为丰镐。这是西安历史上建都之始。故杜甫在《秋兴》诗中有“秦中自古帝王州”之句。



终南望余雪

◎ (唐)祖咏

终南阴岭秀，
积雪浮云端。
林表明霁色，
城中增暮寒。

【赏析】

祖咏(699—746),唐朝洛阳人,后迁居汝水以北,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进士。曾因张说推荐,任过短时期的驾部员外郎。诗多状景咏物,宣扬隐逸生活。其诗讲求对仗,亦带诗中有画之色彩,与王维友善,盖“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或“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故也。代表作有《终南望余雪》《望蓟门》《七夕》《汝坟秋同仙州王长史翰闻百舌鸟》《陆浑水亭》《家园夜坐寄郭微》《送丘为下第》《古意二首》等,其中以《终南望余雪》和《望蓟门》两首诗为最

著名。《望蓟门》诗描写沙场塞色,写得波澜壮阔,令人震动,其中“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为有名的佳句。诗一卷。

据《唐诗纪事》卷二十记载,这首诗是祖咏在长安应试时写的。按照规定,应该是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但他只写了这四句就交卷。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意思已经圆满了。”这真是无话即短,不必画蛇添足。

诗写遥望积雪,顿觉雪霁之后,暮寒骤增;景色虽好,不知多少寒士受冻。咏物寄情,意在言外;清新明朗,朴实俏丽。

题意是望终南余雪。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所见的自然是它的“阴岭”(山北叫“阴”);而且,惟其“阴”,才有“余雪”。“阴”字下得很确切。“秀”是望中所得的印象,既赞颂了终南山,又引出下句。“积雪浮云端”,就是

●历代诗人咏长安●

“终南阴岭秀”的具体内容。这个“浮”字下得多生动！自然，积雪不可能浮在云端。这是说：终南山的阴岭高出云端，积雪未化。云，总是流动的；而高出云端的积雪又在阳光照耀下寒光闪闪，不正给人以“浮”的感觉吗？读者也许要说：“这里并没有提到阳光呀！”是的，这里是没有提，但下句却作了补充。“林表明霁色”中的“霁色”，指的就是雨雪初晴时的阳光给“林表”涂上的色彩。

“明”字当然下得好，但“霁”字更重要。作者写的是从长安遥望终南余雪的情景。终南山距长安城南约六十华里，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阴天固然看不清，就是在大晴天，一般看到的也是笼罩终南山的蒙蒙雾霭；只有在雨雪初晴之时，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贾岛的《望（终南）山》诗里是这样写的：“日日雨不断，愁杀望山人。天事不可长，劲风来如奔。阴霾一似扫，浩翠泻国门。长安百万家，家家张屏新。”久雨新晴，终南山翠色欲流，长安百万家，家家门前张开一面新崭崭的屏风，多好看！唐时如此，现在仍如此，久住西安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如果写从长安城中望终南余雪而不用一个“霁”字，却说望见终南阴岭的余雪如何如何，那就不是客观真实了。

祖咏不仅用了“霁”，而且选择的是夕阳西下之时的“霁”。怎见得？他说“林表明霁色”，而不说山脚、山腰或林下“明霁色”，这是很费推敲的。“林表”承“终南阴岭”而来，自然在终南高处。只有终南高处的林表才明霁色，表明西山已衔半边日，落日的余光平射过来，染红了林表，不用说也照亮了浮在云端的积雪。而结句的“暮”字，也已经呼之欲

出了。

前三句，写“望”中所见；末一句，写“望”中所感。俗谚有云：“下雪不冷消雪冷”；又云：“日暮天寒”。一场雪后，只有终南阴岭尚余积雪，其他地方的雪正在消融，吸收了大量的热，自然要寒一些；日暮之时，又比白天寒；望终南余雪，寒光闪耀，就令人更增寒意。做《终南望余雪》的题目，写到因望余雪而增加了寒冷的感觉，意思的确完满了；何必死守清规戒律，再凑几句呢？

王士稹在《渔洋诗话》卷上里，把这首诗和陶潜的“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王维的“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宽”等并列，称为咏雪的“最佳”作，不算过誉。

